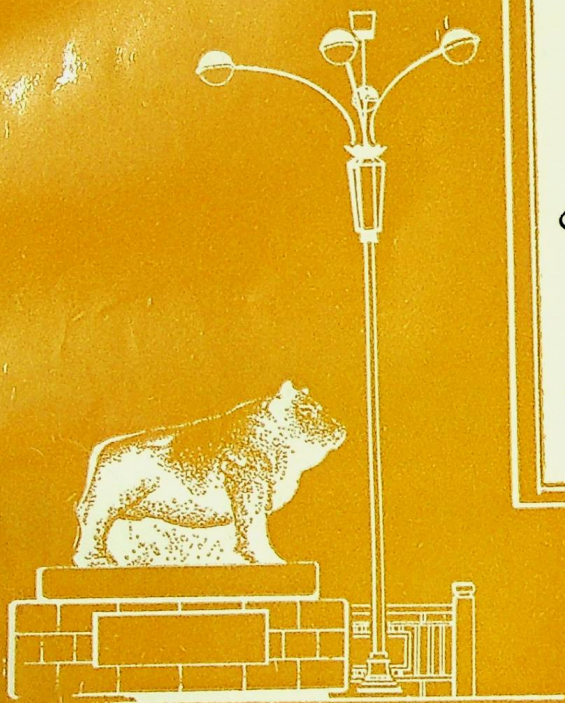


和龍文史資料

第四輯



政协和龙县文史资料

44

编



和龙文史资料

第四辑

和龙市图书馆



DF0000018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吉林省和龙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九月



编 委 会

顾问：张珍淑 刘益民

主任：韩尚熙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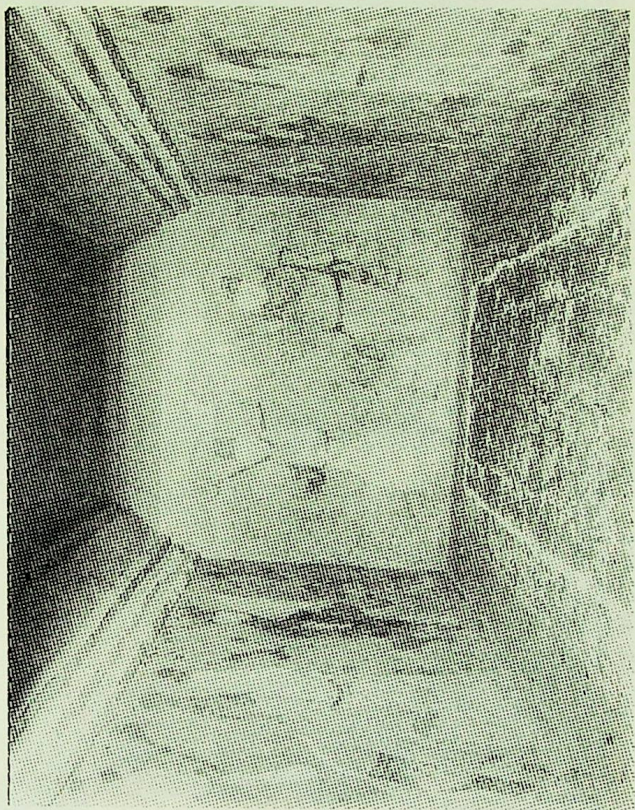
朱鹏飞 刘秉新 陈明信

扬曾顺 姜昌益 崔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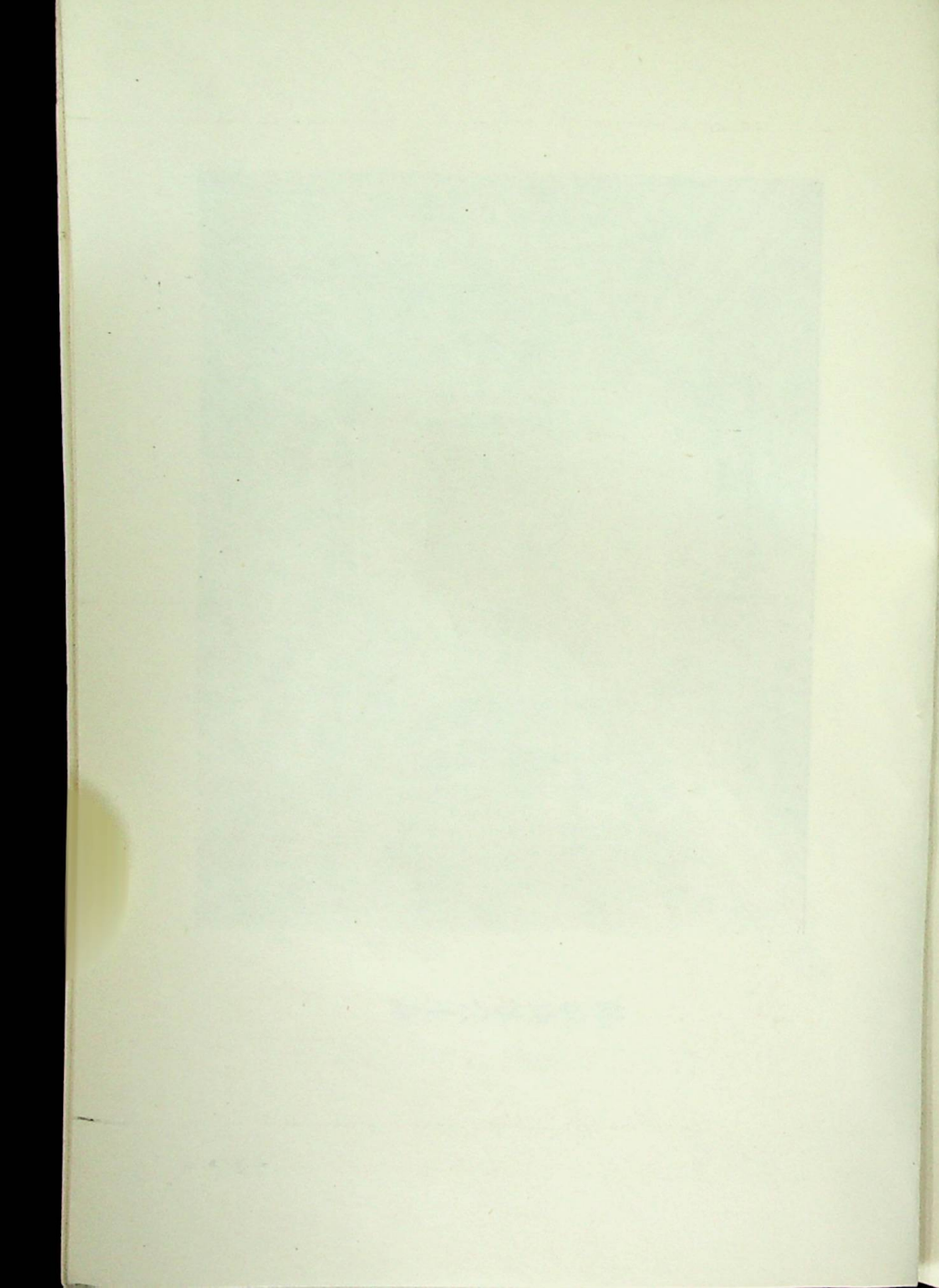
封面设计：崔贞录 梁广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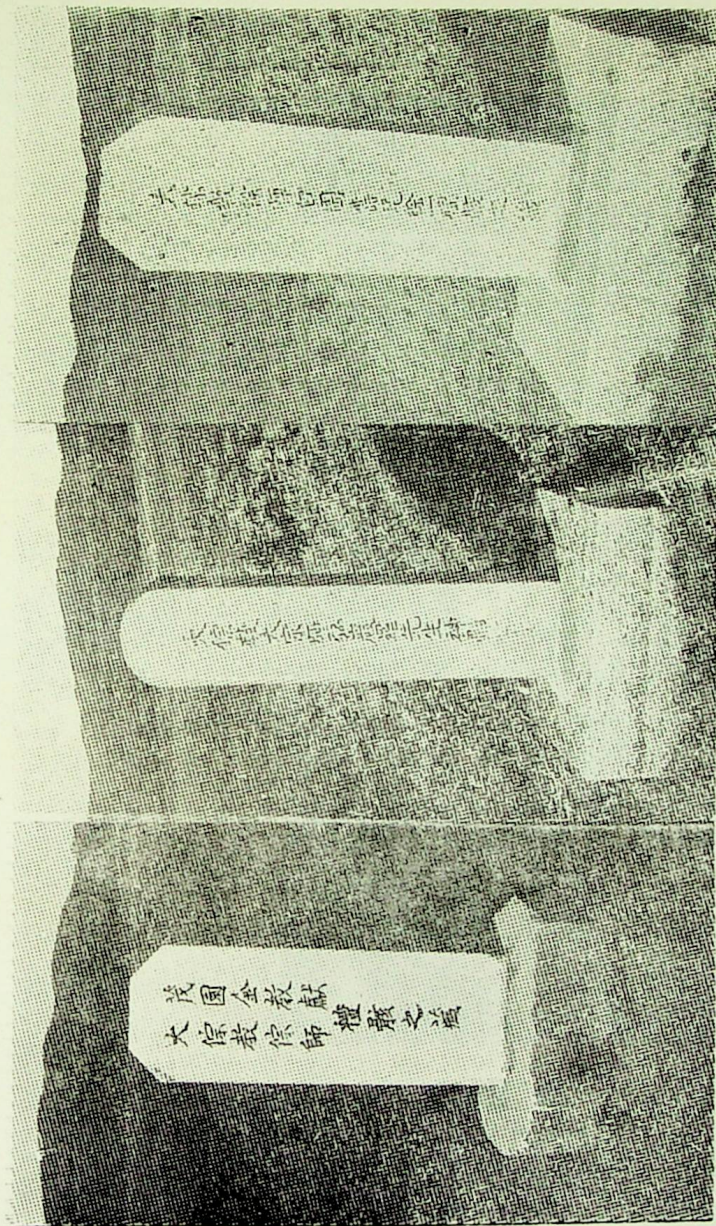
前車之覆
後車之鑒
古為今用
幼學為基

吉林省和龙县政协主席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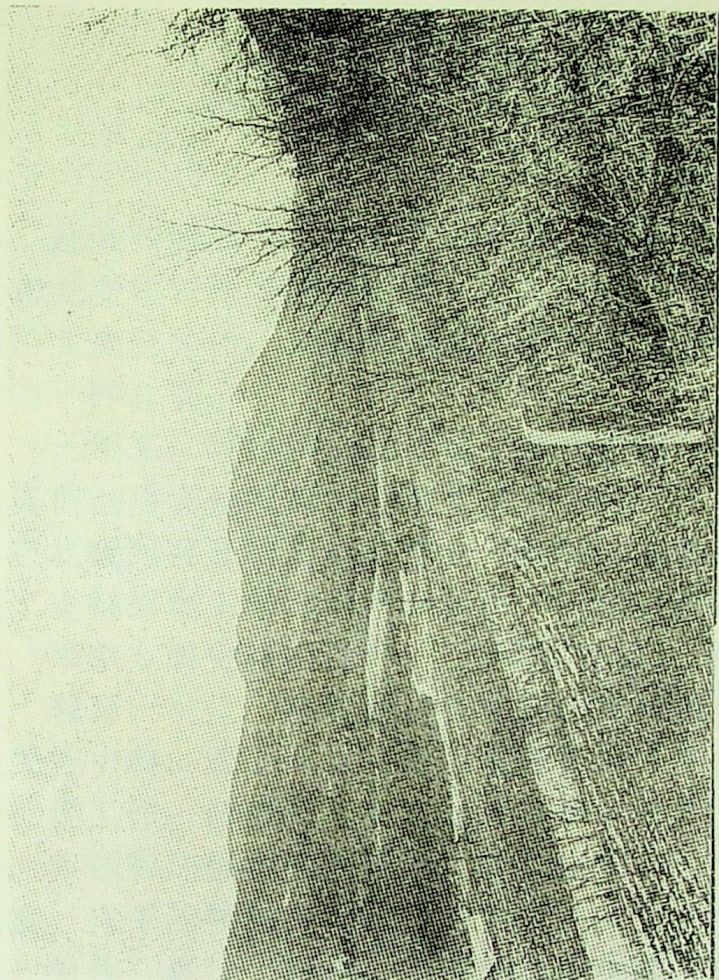


渤海贞孝公主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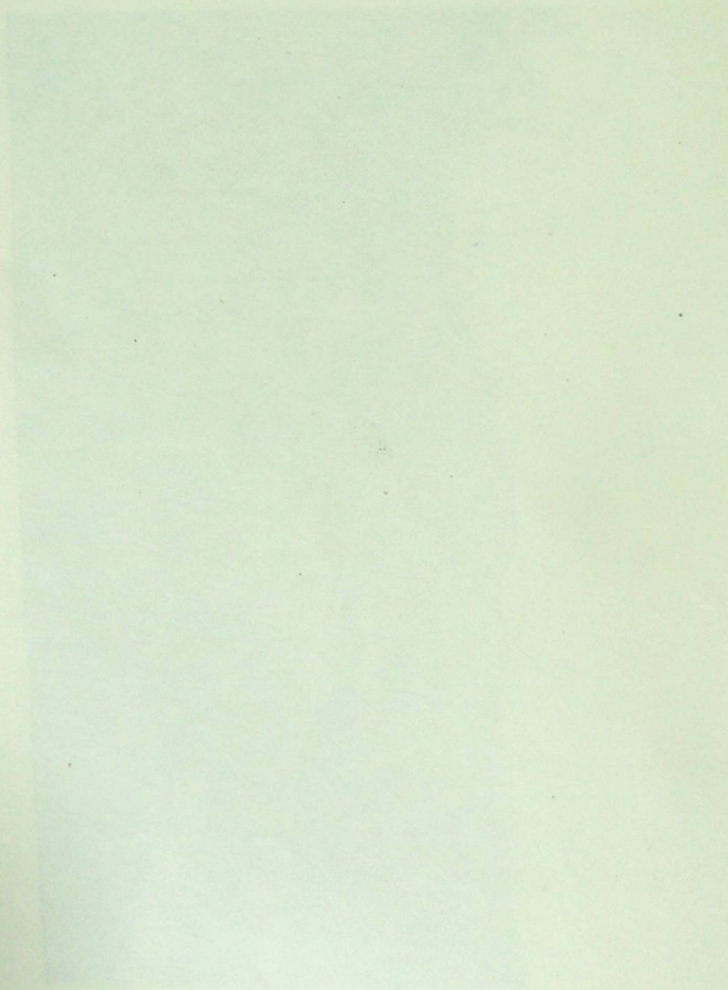




大宗教宗師、徐一、金教獻之墓



青 山 里 战 迹 地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序 言

政协和龙县第六届委员会即将届满时，《和龙文史资料》第四辑朝、汉文版终于同时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值得庆贺并为之感到欣慰的一件喜事。

三年来，政协和龙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于1989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文史工作会议精神，逐步实现了史料征集工作侧重点的转移。在继续抓政治、军事方面史料的同时，注重抓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宗教和社会史料，重视抓少数民族史料，着手开展建国后史料和海外史料的征集工作；调整和充实文史委员会的骨干力量，整顿和加强撰稿人队伍，紧紧依靠一大批热情、肯干的撰稿人和社会各界有关人士，着力“抢救”新见、新闻、新历的具体史料，广征博采，广罗文献，共征集文稿45篇、11万字，从中筛选22篇、5万余字收录于第四辑中。可以说，本辑之成书及出版发行，乃反映了这三年的工作成果，它具有内容丰富、史料

翔实、可读性强的特色。我相信，《和龙文史资料》第四辑，在向全县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不忘过去，珍视现在，展望未来，更加振奋精神，解放思想，敢于开拓进取，乘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东风，进一步改革开放，推进我县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发挥它应有的社会效益。

《和龙文史资料》第四辑的问世，是中共龙县委、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大力支持的结果，也是许多老干部、老教师、史学工作者和爱好文史工作的有识者发扬敬业精神、奉献精神，呕心沥血、伏案疾书、辛勤劳作的结晶。他们大都是早已离退休的老同志，虽然年大体弱多病，却不顾自己，不计报酬，四处奔波，搜集了大量宝贵的具体史料，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发挥余热余光，惠及后人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在本辑的编辑、出版过程中，州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金泽，办公室专职工作人员金仁哲等倾注很大精力，完成修改、审定和翻译任务，使书稿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对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学识浅薄，加之案头资料有限，时间仓促，本辑所录文稿中难免有纰缪之处，敬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张 珍 淑

1992年 8 月 15 日

○ 开拓、开发史料 ○

- “龙青铁路”工程修筑始末……………王国祥(1)
解放前和龙林业简述……………韩尚熙(5)
明岩村史话……………姜龙权(10)
大兴电灯公司纪略……………何庸(19)
伪和龙专卖局杂忆……………金兆奇(28)

○ 民国，伪满史料 ○

- 民国、伪满时期的崇善乡……………崔贞录(32)
日本鬼子火烧三道沟……………胡寿春(44)
“日野骑兵第十团”二三事……………张骞(47)
延安村的一次兵匪之乱……………张怀刚(51)
日伪时期的“救济会社”……………张作臣(55)
日伪时期的“出荷粮”……………张作臣(57)

○ 反帝反封建斗争史料 ○

- 青山里大捷……………金石(60)

- 红旗河畔两次胜仗……………郭永馨(80)
“德化事件”……………卢维发(85)
和龙县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郭永馨(91)

○ 文化、教育、宗教史料 ○

- 贞孝公主墓志并序……………郭永馨 译(95)
略谈渤海与唐王朝文化上的亲缘关系……
……………郭永馨(100)
协和学院到光兴中学……………何庸(105)
解放前和龙县的天主教和基督教……………
……………金熙银(109)
大综教与清波湖……………金石 金仁哲(116)

○ 人 物 ○

- 抗日女勇士——文斗灿……………朴长成(128)
名医——南鹏翬……………胡寿春(137)

- (08) 蘇永春..... 針灸高難雜症
- (09) 黃顯代..... 針灸學
- (10) 蘇永春..... 婦科中藥

◎ 林文慶宗 著 卷 二 五 支

- (01) 針灸學..... 針灸學
- (02) 針灸學..... 針灸學
- (03) 針灸學..... 針灸學
- (04) 針灸學..... 針灸學
- (05) 針灸學..... 針灸學
- (06) 針灸學..... 針灸學
- (07) 針灸學..... 針灸學
- (08) 針灸學..... 針灸學
- (09) 針灸學..... 針灸學
- (10) 針灸學..... 針灸學

◎ 林 文 慶 著 卷 二 六 支

- (01) 針灸學..... 針灸學
- (02) 針灸學..... 針灸學

“龙青铁路”工程修筑始末

王国祥 整理

本世纪40年代，如今的和龙镇火车站所在的地方称“青道沟”。龙井至和龙的铁路线建路时始称“龙青线”。这所铁路线，自龙井站起，经东城（原称东古城子），龙水坪、八家子、官地至终点和龙站，全长52公里399米。该线修筑工程，于1938年5月动工，1939年12月26日起试运营，1940年6月全线竣工，同年七月正式通车。这一年和龙县公署由如今的龙井市大砬子（今知新乡）迁到三道沟（今和龙镇），遂改“龙青线”为“和龙线”。

日本侵略者修筑“龙青线”铁路的目的，就是通过这条钢铁运输线，不仅可以更大肆掠夺和盗运和龙乃至安图地区的富饶资源，而且能够更有效地镇压这里的反日武装斗争，维护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据1966年吉铁基字

304号文件称，日本人修“青龙线”铁路，曾企图从龙井经三道沟，安图（今松江），抚松、濛江（今靖宇），直至沈吉线的朝阳镇，打开一条畅通无阻的输送线，又可将至三道沟的铁路向南延伸，连结朝鲜咸镜北道的茂山，从而构成其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均十分有利的循环路线，同时使该线在龙井接轨后，可直接经朝（阳川）开（山屯）、长（春）图（们）二线直至朝鲜，将对把各种物资转运日本十分便利。

“龙青线”铁路修筑工程开工前，先由伪满洲国“炭矿株式会社”规划，“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属牡丹江建设事务所测量班1937年5月10日至7月3日赴现地勘测。最后核定该线设计方案线路轨距为1.435毫米；最大坡度正线区间为12.5%，曲线半径不得最小于300米；钢轨正线和站线均为32公斤A；桥梁载重量钢桥不得超过20吨，铨拱桥，铨T、板梁及铨涵渠均22吨，路基宽5.5米。全线设5个站（不包括龙井站）。

“龙青线”的施工，由当时设在龙井村的“南满洲铁道建设事务所”主持，采用发包

形式，由两家日本包商承包，全线工程分龙井和青道两个工区，于1938年5月开工，1939年9月完成全线路基工程。同年10月10日，从龙井站开始人工铺轨，后改用满铁“老巴奇”式铺轨机辅轨，是年12月12日全线铺轨结束，12月26日起试运营，全线工程于1940年6月6日竣工，7月正式通车。“龙青线”铁路工程总投资6,925,000元（伪满币），每公里平均造价为132,156元。

据1934年日伪调查，海兰河上游和古洞河流域及南部的红旗河流域均为原始森林，面积为710平方公里，木材总蓄积量为91,246,400立方米。三道沟、松下坪、四道沟、土山子、官地一带均有煤，面积为2,380平方公里，埋藏量为2亿6000万吨；已开采的英洞、夹皮沟、转心呼、四人班和天元矿区，产煤面积16.86平方公里，埋藏量为1亿4800万吨。“龙青线”通车后，日本侵略者大肆掠夺了这一带农、林、矿产资源。仅1941年，经“龙青线”外运的货物就达51万4000吨，而经该线运进来的货物只有27.979吨，货物发送量与到达量相差18.4倍。

在“龙青线”铁路工程施工期间。日本侵略者除动用间岛派遣军、会社警备队、警察队外，还派100余名军警，不分昼夜，轮番巡逻，严加警戒，还是受到了我抗联部队的数十次袭击。据该线建设概要的不完全记载，仅1938年至1939年间，先后就有34次，其中使日寇遭受沉重打击的竟达24次之多，击毙10人，击伤7人。被迫参加该线修筑工程的中国劳工，也或消极怠工，或举行罢工，阻挠和破坏了日本侵略者的工程计划。1940年2月，在八家子站附近搞采砂作业的中国劳工，因不愿为侵略者卖力带头罢工，立即导致全线劳工的一致行动，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解放前和龙林业简述

韩尚熙

和龙这个地方，设县之前称“和龙峪”。

“和龙峪”一名，曾出现于清光绪8年（1882年）清朝政府与李朝政府间签定的《中韩商务章程》之中，据传因此地形状得名。

清光绪28年（1902年）前，和龙峪属珲春副都统衙门管辖，翌年2月，“和龙峪分防经历”开厅，3月和龙峪转归延吉厅所辖。宣统元年（1909年）9月，裁撤珲春副都统衙门，和龙峪属吉林东南路兵备道管辖，同年11月27日延吉厅升为延吉府，和龙峪分防经历又归延吉府所辖。1910年3月11日和龙峪分防升为和龙县，始设县置大砬子（今龙井市智新）。

和龙县地处长白山东北麓，西南及北部地势渐高，丘陵起伏，深山峡谷，绵延不断。崇善西北部红旗河上游，屹立着诸多崇山峻岭，

海拔均有1000米以上；北部之甑峰岭和英额岭两道山脉中间夹着一个三道沟平地，向南延伸，山峦迭障，直到图们江岸。这一带山高林密，树木参天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森林资源，被誉为“树海”。

清光绪7年（1881年）12月，清廷核准吉林将军铭安的奏请，命令废除吉林南部禁山围场旧制，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之后，图们江以北地区，封禁大开，移居和龙境内的朝鲜人越垦者日益增多。

清光绪9年（1883年）9月，清政府与朝鲜李氏王朝政府签订《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翌年，根据该章程在和龙峪设通商局，在光霁峪设分卡，办理与朝鲜会宁、锺城等地方通商贸易事宜。1885年，图们江以北长约700余里、宽40至50里的地区划为朝鲜垦民专垦之地，前一年设越垦局，专管朝鲜垦民事务。从此更有大批朝鲜移民纷纷迁入和龙境内，人口剧增。清光绪20年（1894年），和龙峪抚垦局（原称越垦局，1890年改称为抚垦局）管辖4堡39社，共有垦民4,309户，20,899人，呈报的熟地15,400余公顷。（参见《和龙

县地名志》，“行政区划沿革”。)此时，图们江以北及海兰河畔的平原一带均被垦植所占，沿岸森林多被砍伐，烧荒垦地，建造民房，使大片森林化为耕地，林业资源逐年减少。

进入本世纪第一个年代后，和龙县林区内，始有小股本帮私自进山伐木，但其规模小，森林资源变化甚微。

1910年之后，木帮进山伐木规模渐大。政府随即加强对国有森林的采伐管理，始设林政机构，制定森林保护，采伐管理，奖励造林等一系列法规，断然限制了随意采伐森林权，凡进山采伐森林者，须向政府呈清执照，才能从事砍伐业。

1923年至1928年，先后有张玉林外4名和张凝浦、王中山等人从延吉分局领取和龙林区的采伐许可证。张玉林外4名设的采伐林场，在二道沟、蜂蜜沟、青山3处，面积共150方里（每方里25公顷，计3,750公顷）。张凝浦在海兰河上游，设采伐林场200方里（5000公顷）；王中山在外四道沟设采伐林场20方里（500公顷）（据1937年延吉林务署概要）。

1930年至1944年，日本侵略者进入和龙林区。茂森林业公司蔚森采木所，在长山岭，大马鹿沟、许家洞、黑瞎子沟、沙金沟、四道沟和五道沟等林区大肆掠夺森林资源，所采伐的木材经红旗河、图们江水输送到开山屯。但在这一期间，除日本材商，资本家外，1936年起官方采伐作业日兴。伪延吉森林事务所（龙井营林署前身）修筑了一条由龙井至古洞河林区的森林铁路。这条“森铁”以龙井贮木场为起点，经由头道沟、二道沟、得味洞、仲里村，过越窝集岭，进入古洞河流域林地。1937年7月，铺设森林铁路125.5公里，据1937年7月的《延吉林务署内纪要》记载，古洞河森林作业所以从1937年开始在卧龙湖，古洞河一带林区，年采伐红松259,580石（86,526立方米），白松139,980石（46.60立方米），宽叶树285³石（951立方米），年采伐量计402,413石，合为134,000立方米。

日伪时期的采伐方式，完全是掠夺式的“拨大毛”对所有森林稠密区、择优弃劣集中轮伐，采伐树种百分之80、90以上为红、白松，其次为核桃秋、黄菠萝、榆木、水曲柳、直径

均在40公分以上，而木材达不到径级要求或稍有虫眼、大节、腐朽等毛病便弃之。

1942年至1944年日本侵略者利用古洞河林区森林铁路共运输木材328000立方米，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一切日伪时期的林业机构及设施均由和龙县临时政府接收，森林管理权才回到了人民手中，

本文选自《和龙县林业志》一书

2022-9-30

明 岩 村 史 话

梁焕俊 口述

姜龙权 整理

和龙县西城镇明岩村形成一个村庄，是迄今80多年前的事。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并朝鲜后，大批朝鲜人背井离乡，过鸭绿江，和图们江移居中国。就在这一时期，姓梁的20多户人家结伴来到明岩村落脚。

他们原来住在朝鲜咸镜北道城津郡（今金策市）鹤城面达莱洞，达莱洞是个山村，土地贫瘠，十年九不收，全村80多户人家，家家都过着极为贫穷的日子。

“庚戌国耻”前夕，村里人的生活更加凋敝。几家大人们眼看生路渺茫，便聚在一起议论移居中国的事，商定先派人到中国去看好合适的定居之处。众人推举梁太允去办此事。他早年曾出去闯荡过外地，梁氏门中唯有他见多

识广。梁太允领着另一人，到延边选定的移居地，就是如今的明岩村。那时，这里只有几户人家，有一个从山东过来的中国人“占山户”名为王福者，占据着大片荒地，故人称此为“王家地方”。

“王家地方”里，早已住着全氏和另外两三户朝鲜人。他们都是王福的佃农，全氏也是朝鲜城津郡人，他在异国他乡见到老乡，格外高兴，一再劝梁太允携众人迁居这里。梁太允也看中了山青水秀，土地肥沃的这个地方。他回到达莱洞向乡亲们讲述明岩村的所见所闻，村上的穷户无不踊跃表示赞同，不几天便有20多户人家着手进行了迁移前的准备。

1910年11月底，有一支20多户、150多人的移民队伍，冒着凛冽的朔风离开了达莱洞。他们路经城津、吉州、明川、镜城、富宁，抵达图们江畔的会宁。虽已过12月中旬，天气寒冷，可图们江还未完全封冻，他们只好在会宁滞留一周后，才过江进入中国境内。他们一行经三合、龙井、头道沟等地，几天后到了明岩村，终于结束了将近持续一个月之久的长途跋涉。

他们在明岩村落脚后，解决耕地问题成了生计悠关的头等大事。恰在此时，“占山户”王福遇到不得已的情况，给移民们购置耕地提供了良机。

1904年，王福从山东来到这里后占据大片荒地，成了“占山户”。因其父辈遗产继承问题，须马上回山东老家。对没有土地的移民们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天赐良机。可是，不入清朝国籍者，便没有土地购买权，而要入清朝国籍必须“剃发易服”。这是具有民族自尊心的他们所绝对不能接收的。于是，他们只好无可奈何地找来了“户主人”。所谓“户主人”是指已入清朝国籍的朝鲜人中，替代移民做土地“主人”的“归化人”。

移民们请已入籍的韩允极为“户主人”。韩允极会说一口流利的清国话，也有一些声望。移民们借他的名义，购买了王福的所有土地。从此，明岩村的土地，官府的地契上虽是韩允极所有，但实际上是成了大家的，土地是按凑钱数额大小来分给了大家，凑钱多的人家，可以要既近又好的沃地；凑钱少的人家，只能得到又远又孬的土地。梁太允一家钱少劳力多，要了江边的一片柳树甸子。

“占山户”王福怀揣卖掉房产和土地得来的钱，回到山东去了。他曾拥有正房2栋，还有几间厢房、库房、磨坊和粮仓。20多户移民，把王福的库房、粮仓和磨坊改成临时住房后，连同正房一起，几户合住一间，十分艰难地熬过了头年冬天。第二年开春后，他们一边忙于农事一边合力盖起一栋栋新房，逐渐过上了一家一灶的日子。

开垦出来的土地上，种上了谷子、大豆、玉米、燕麦、大麦等。谷子、大麦和玉米做口粮，大豆卖钱，购置些牲畜和家禽以及食盐、布等生活用品。

明岩村人开始种水稻，是他们移居这里5~6年后的事。在达菜洞，只种过早田的移民们到延边后才想到了学种水稻。

在明岩村里，第一个开始种水田的是梁太允。他因缺钱才买到的江边那件柳树甸子，没曾想如今却成了利于开水田的好条件。头一年，他开了两亩多点水田，取得好收成，摸索出一些耕作经验，第二年逐渐扩大了水田面积。与他家地相邻的人家也跟着开了水田。到1919年，这里的水田已经连成了好大一片。

明岩村人从移居初开始就十分重视教育。1912年夏，全村居民总动员盖校舍，创办一所学校，校名为普进学校。第一任校长为李强国，教员有梁焕凤、柳容熙、金定植等3人。教员的生活费用，全由村里负担，当初，各家凑钱买王福的土地时，先划出了一块“学田”。成家的教员可以无偿得到一份学田自耕自种，收获归己，作为教学报酬。可是，一旦不教书或迁移他处；就得归还学田。独身教员则在村里吃排饭，一个月为期，依次序挨家轮换。每到秋天，村里人就凑些钱，做一身衣服赠给独身教员。耕耘学田、教员的衣食住以及经营学校等一切劳作和所需费用，不管有无学生，全村各家各户一律分担同等的义务。

建校初期，普进学校招20~30名学生，教授朝鲜语文、千字文、中国语文、算术、修身、博物、图画、体操、习字、唱歌等课程。在普进学校里执教的教员，无一不是从朝鲜亡命而来的进步人士，由于受他们的熏陶和影响，培养出来的学生们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在反日斗争中当先锋。

从达莱洞迁移过来的20多户人家都是耶稣

教信徒。他们于1912年创办普进学校的同时，还建起一所教堂，进行了信教活动。从此，邻近的人们称这个村为“耶稣村”，但它并不是真正的村名，他们觉得原来的“王家地方”该有个新村名。于是，耶稣教信徒们集中的这个村里人，起了个“藏恩坪”（藏有上帝恩惠的平地之意）的新村名。在耶稣教信徒占绝大多数的10年代初，这个村名不曾惹起什么异议。可是，随着非信教的户数逐年增多，村民们把“藏恩坪”弃之不用，改村名为“明岩村”。然而，在本世纪20年代，“藏恩坪”和“明岩村”两个村名并驾齐用，直到30年代满洲国成立后，才定名为“明岩村”。

明岩村人自移居初开始，就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恨之入骨，只要是以反日为宗旨的事情，无不合众共济，齐心协力。1916年夏，头道沟日本领事分馆的日本人巡查1人和朝鲜人巡查1人，着便衣来到明岩村，以进行民政调查为借口，暗地里探听鼓吹民族独立和排日思想的主谋者。愤怒的村里人，把两个巡查拖到江边打了个半死，还让朝鲜人巡查发誓不再做日本人的狗腿子，才放他回家务农。明岩村人们具

有何等强烈的反日情绪，从这一事实也可见一斑。

耶稣教会每年举行一次“诵经会”。在平岗平原范围内举行时，聚集在明岩村，在延边地区范围内举行时，则聚集在龙井，而在咸镜北道范围内举行时，就聚集在元山。“诵经会”不仅是一次盛大的教会活动，而且在特定的环境中也是鼓吹反日运动的一种集会。1920年11月，咸镜北道范围的“诵经会”在元山举行。明岩村为了安全起见，只派了一名信女。

在朝鲜暴发“3·1”运动，继而在龙井举行“3·13”反日示威后，明岩村男女老少就齐动员，参加了在二道沟和头道沟举行的反日示威活动。

具有反日斗争传统的明岩村人，不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率先燃起了抗日斗争的烽火。从这块土地上涌现出许多知名的反日志士，也是理所当然的。

“3·1”运动后，延吉、和龙、汪清3县反日志士联合建立“间岛国民会”，下设东西、南、北、中5个地方会。位于和龙县平

岗平原的安恩坪、高坪、南沟、北大地、救世洞、明岩等村被划归为西地方会。西地方会就设在明岩村，韩允极任会长，梁亨植、梁郡植（梁焕俊的父亲）、李太彦等为骨干，积极开展了活动。1919年秋，汉城普成学校毕业生、“间岛国民会”司法部长崔翊龙就以明岩村为基点，住在梁郡植家里，进行反日活动。

在延边朝鲜族人民反日武装斗争蓬勃兴起的日子里，明岩村人送许多青壮年加入反日武装部队，同日寇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并积极支援了反日武装部队。1920年秋，洪范图独立军部队袭击头道沟日本领事分馆后，向渔浪村方向转移时，明岩村群众杀牛犒劳将士，凑钱买些内衣，买布染色缝制军装送给了部队。著名的青山里战斗打响之前，明岩村人在筹粮、打草鞋支援部队，派牛车承担反日部队的运输任务等方面也都很积极、主动，做出了很大贡献。

随着明岩村名声日益大震，许多著名的独立运动家和亡命者或扮成农夫模样，或以教师的身份，先后来到这里开展了反日革命活动。

张时雨（朝共满洲总局宣传部长）夫妇，金光日、梁昌杰、朴昌浩等仁人志士，就是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著名的反日革命家金策及其兄金诚和禹龙善（朝共满洲总局东满道书记）等人也曾在明岩村活动过。

无论在20年代随着马列主义及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而出现的朝共党活动时期，还是在“9·18”事变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明岩村许多优秀儿女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乃至牺牲宝贵的生命明岩村普进学校毕业生李东鲜、朴允植、安正奎、李柱凤等人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参加东北抗日联军，在同日寇殊死战斗中英勇献身。

大兴电灯公司纪略

何 庸

清末和龙农村出现了一大变化。光绪7年（1881年）清政府废除禁山围场，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一时关内汉人大量涌来占荒开地。他们买通官府，捷足先登者，不费吹灰之力，一朝巧取豪夺大片土地，成了“占山户”。光绪16年（1890年），清政府改招垦局为捶垦局，专办朝鲜移民的开垦事宜。早在这以前同治年间，朝鲜北部灾民就纷纷冒禁入境，开垦大片荒地，揭开了和龙开发历史的第一篇章。

本世纪20年代前后，不少“占山户”们榨取众多垦民的膏血，富裕起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逐渐把目光投向城市，着手经营工商业。这类人物在头道地区亦颇不少见，如郭景升、杨乾一、武树勋等人即是，尤以武树勋

为最突出。他创办大兴电灯公司，为后人所称道。

武树勋号佐臣，是著名的“武家大院”当家人。当年的武家大院，位于头道街西南角，是这一带屈指可数的大“占山户”，旧址为今头道第二小学校舍及附近处。武家到了武树勋这辈，共有兄弟9人，他排行老六，人称武六爷，是个颇有手腕的当家人。他曾为武家继续致富，构划出了一个创业大计。土地经营方面，那时武家虽已有良田230余垧，但他并不满足。他看到，在头道地区已没有多大可能象从前那样轻而占有大片沃土，便从侄辈中择出较为能干的武翔九派往黑龙江省三江地区，在密山、宝清二县购置一片又一片新处女地。他本人则坐镇延吉，占延吉、头道所谓“南北二岗”发展工商业，先后办起了“天”字号的系列商号：天兴源烧锅、天兴德药房、天兴源杂货庄等，都曾驰名一时。不几年，武树勋的社会地位，随着其经济势力异军突起，节节上升，成为延边五大商埠（龙井、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琿春）风流人物名闻遐迩了。这时，他看到延边五大商埠中只有琿春一地有电灯，便矢

志办电，先着其长子武竞南（曾留学日本）在龙井、延吉、头道三地考察，进行可行性研究，以窥究竟。武竞南经过一番考察，从工商业、地理位置、交通、水源、能源等诸方面考虑，认为三地办电都很有前途。这使武树勋更加坚定了办电的决心。拿定主意之后，1919年，武树勋终于把办电的想法付诸了行动。他牵头联络龙井商会会长韩云升、头道商埠局局长屠桂林和工商界志同道合之士：刘振之、武振民、苑绶忱等六人，共同发起筹办延吉县（今龙井市）电灯事业，即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经北京政府农商部、交通部注册核准，于同年8月取得办电业许可证。武树勋便积极倡导，四处奔走，招募人才，筹划建厂方案，拟定《电灯公司招役简章》和《公司章程》等文书，并以集资入股的形式开始筹募资金。

公司经过一番努力，共得股东92人，股金10万元。其中武树勋一人入股440份、2.2万元，为股东之首。武树勋原计划在龙井、延吉、头道三地分期建厂，龙井为第一期，延吉为第二期，头道为第三期。不曾想，动工以后不久，即碰到了资金困难，不消说建三个电

厂，连建龙井一处电厂的资金都不足，竟陷入骑虎难下的地步。为了把建电厂工程搞下去，1921年6月10日武树勋痛下决心，以公司名义，并以公司全部建筑设备和235垧7亩8分熟地的19张执照作抵押，以月息1.5%的利率，向日本人经营的“间岛救济会社”借到2.5万元，解决了建厂资金不足问题。此时，公司的入股资金的总额已达12.5万元。

1920年9月10日，武树勋和韩云升等人发起召开了开办电灯营业的第一次创立会，正式成立了以民用照明为目的，发、供、销联合经营的“延吉华兴电灯股份有限公司”1921年6月，北京政府农商部公布关于同一类企业单位不得有同名的规定，因华兴电灯公司与湖北省鄂县华兴电灯公司重名，将“华”字改为“大”字。1922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二次创立大会上，正式改称“延吉大兴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并定4月22日为大兴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纪念日。

这次会议上，全体股东一致选举武树勋为创立会主席。根据《公司选举章程》规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了总经理、经理、董事

和监察人。武树勋、韩云升、阎景春、阎德永、武常仁、郭万选、林修园等7人当选为董事。张天德、廉殿甲当选为监察人。经董事会选举，武树勋当选为总经理，郭万选当选为经理。在以后的两次选举中武树勋受众人之托连任总经理；傅本和、唐锡斌先后当选为监察人。1923年4月10日，公司设营业部。聘任职员6人；设机械部聘用技术工人5名。至此，公司所需机构设置停当，各部办事人员均已到位。电厂工程告终。

在加紧准备安装、调试时，突然，又发生了意外的事端。公司在最初购买发电设备及其它机械器材时，曾与日本人经营的朝鲜庆尚北道大邱市云町大兴电气株式会社经理小仓武之助商洽，并正式签订了购买一台全套发电设备及器材的合同，且交付6000元（现大洋）保证金。不料，小仓来龙井看了一次，断定大兴电灯公司有利可图，竟产生了覬覦之心，遂施出卑鄙伎俩，制定了所谓《开发电力事业实施方案》，意在夺取武树勋的办电之权。武树勋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方案》小仓便借故迟迟不发货，妄图从此钳制武树勋，向之施加压力；

而武树勋也寸步不让，据理抗争，坚决要求小仓履行合同，这个丑恶的日本人，以“援助外国违反本公司原则”为由，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拒绝提供全套发电设备，只以大兴电灯公司预交的6000元为基数，提供了部分机器设备。大兴电灯公司依靠朝鲜大兴电气株式会社提供的全套发电设备安装的计划，成了泡影。

武树勋为了不致使办电工程功亏一篑，前功尽弃，想方设法，寻求新货主，最后，与日本大分县九州水力电气株式会社重新订了购置发电设备器材的合同，终于得到了所需全部设备和器材。

1923年，大兴电灯公司辞退了原日本技师清水一郎，招聘了白俄技师捷列斯基。全套设备运抵龙井后，在捷列斯基的指挥下，安装、调试和架设市内输电线路等工程，均顺利进行，武树勋多年悬着的心也才放了下来。

武树勋经营的大兴电灯公司经过五年的筹建，克服种种的困难，终于在1924年6月21日竣工，7月24日正式送电。从此，龙井居民第一次，利用电能照明，结束了千百年来点油灯的历史，开创了龙井地区电业发展史上的新纪

元。

大兴电灯公司虽属私人企业，但并未忘记公共福利，为龙井主要街道上免费装设路灯，博得了市民好评。

1927年后，大兴电灯公司内部发生股东之间的矛盾。正当武树勋准备搞第二期工程，延吉发电厂筹建时，公司股东吴兆凤、张斌、曹铎龄、毕克成、殷明德等6人，背着武树勋同延吉军界人物梁泮，（东北陆军第13旅8团团团长，颇有财势）相勾结，摈弃武树勋，由他们出面开办延吉发电厂。武树勋当然不肯相让。双方均向吉林省政府起诉，一连打了三年官司，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最后由韩云升、郭素忱等人出面调停，直至1931年7月以后才有所缓解。

“9·18”事变后，日寇加紧掠夺我国东北资源，垄断了电业经营权，成立了《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并在延边地区成立了它的分社，称“延吉电业会社”。1936年6月，“大兴电灯公司”被“延吉电业会社”强行收买。1937年2月15日，延吉发电所开始向龙井供电。这样，由武树勋等人同舟共济，苦心经营的龙井大兴电灯公司，终究未能摆脱日本侵略者毒

手，宣告于闭。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悲哉，惜哉。

〔附表之一〕大兴电灯公司二年度收支统计（单位：元）

收支 年别	收 入	支 出	盈 利
1925	32.682元	31.170元	1.512元

〔附表二〕：大兴电灯公司筹建资金使用情况（单位：元）

项 目	金 额	说 明
建 筑 物	26.540	电厂一切建筑物
机 械 器 材	64.530	电厂全部机械及附属设备
租 户 物 品	25.600	用户使用的一切电器材
路 线 物 品	78.640	电柱、电线、磁瓶、变压器等
总 计	217.357	

笔者附记之一：武树勋已谢世半个多世纪，头道人至今仍时常谈及此人，无非称赞他

当年专心致志办电，不向困难低头，不怕日人胁迫，为人敢作敢为，终于办电成功，此谓“有志者事竟成”岂不难能可贵否？然武氏与鬼子周旋之际，虽有与虎谋皮之误，也有虎口拔牙之勇，勿庸过于苛求于此了。

笔者附记之二：武树勋自成立大兴电灯公司之日起，便放弃了在头道沟的酿酒制造业——天兴源烧锅，一心倾注于办电事业，为早日发电，奔波操劳。当然，就其本人来说，旨在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然此乃终究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武氏亦不亏是一位社会显达的开明人士。可惜他生不逢时，背后没有一个支撑他事业的政府，手头缺乏足够财力，以致不得已而乞求于外人。这无异授人以柄，饮鸩止渴。故曰武氏在办电事业有智亦有勇，其愚蠢不及之处，亦可叹也。

本文参政材料：

- 1、吉林省档案馆卷宗
- 2、延吉县历史档案馆
- 3、龙井发电厂历史资料

伪和龙专卖局杂忆

胡寿春 赵云阁 口述

金兆奇 整理

从1940年冬至1942年春，我在伪和龙专卖局当过杂役，对那里的情况略知一二，赵云阁在伪和龙专卖局曾多年工作过，知道的事情比我多些，可是事搁多年，忘得差不多了，只能回忆尚能记得起来的一些情况。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后，“专卖”成了他们榨取人民膏血、掠夺东北地区丰富资源的一条重要渠道。专卖品种比任何历代王朝都多，且有增无减，食盐、石油、火柴、面粉、酒精等生活必需品都实行了专卖。建立了一整套专管专卖的机构。在伪满洲国政府所在地新京（今长春）有专卖总局。各省有专卖署，县里则有专卖局和专卖分局。

伪和龙专卖局是在1933年设立的。日本侵略者把军阀张作霖统治东三省时遗留下来的盐仓和缉私队加以合并，成立了伪和龙三道沟专卖局。1940年伪和龙县公署从大砬子迁到和龙街后，改称和龙专卖局。旧址在和龙镇东南角原李永春家大院东边，即现教具厂位置。

专卖局里设有4个大仓库，办公室和家属宿舍各有1栋，专卖品种有食盐、石油、火柴和面粉。

伪和龙专卖局隶属于“间岛省专卖署”，下设3个分局：高岭崴子分局，分局长姓孟；南坪分局，分局长姓薛，绥中县人；古城里分局，分局长姓甚名谁也记不清了。

各分局不经营专卖品，只监察有无违犯专卖条例的事情。

在设立伪和龙专卖局后的头5年，全由日本人当局长，他们的姓名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有个叫神琦的人，1938年来了第一个中国人局长柏昆，他是家住北平的满族人，柏局长于1940年冬年老告退。他在职时，还有一个叫松井的日本人当主任，也于那年冬天调去“间岛省专卖署”。同年，由辽宁省调来新局长李

锺文。他是海城县八岔沟人。翌年春又调来一个日本人武田孝当主任。1942年春，李锺文调往黑龙江省穆稜县专卖局当局长，同年，武田也调去“间岛省专卖署”。同时，由黑龙江省望奎县专卖局调来一个新局长，他是个朝鲜人，本姓尹，却叫做平沼大作。

平沼到任后，再没配日本人主任，他一直干到1945年光复。

伪和龙专卖局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及职务分工，是这样的（以1941年为例）。

局长李锺文，主任武田孝；下设庶务、经营、监视三个系。

庶务系负责行政事务及财务，负责人为焦连元，是个属官，职员有何慕舜、权宗起等人。

经营系负责销售、业务及发放许可证等事宜。负责人为南富次郎，他是个朝鲜人，原名南京燮，是个委任官试补。职员有姜祥龙、宋长贵、李东洙等人。

监视系负责监察市面上有无违犯专卖条例的事情。监视官为李绍华，也是委任官试补。监视员有赵云阁、李东万，还配有佣人（不属职员）。有石本法、崔东赫、金凤基、刘玉

山、罗某等人，协助监视人员的工作。

记得1942年春，有一天，监视官李绍华等人把(莲芳屯今合新屯)农民贾鸿泰捉到专卖局里，原来他们在贾家翻出来30多斤本地面粉，遂以违犯专卖条例论处，给以严厉训斥还不算，还罚了款。在那黑暗的年月里，农民把自家种的麦子磨点面吃也是“犯法”的。

伪和龙专卖局院内的4个大仓库里，分别储存面粉、石油、食盐和火柴。全县各村屯专卖品经销点、饭店、面食店和杂货店的经营主，都得到这里凭购货证提货，然后再用牛马车运走，按通帐(即购买证)定量供应给居民。那时全县境内许可经营专卖品的商店，有青山里的杨化南商店，古城里有黄鹤鸣商店，南坪有姓芦的商店，土山子有董承烈和杨克己商店，和龙街里有辛凤林、东兴合、天增泰、东日兴等商店及张义良、马振帮小铺等，这些商店和小铺虽然按通帐零售给居民，但在那物资紧张的年月里，送人情走后门是自然不消说的。

专卖品批零卖的钱，一律全部上交省专卖署，县专卖局是无权动用的。

民国、伪满时期的崇善乡

崔贞录

崇善乡，离县城和龙镇西南81公里。位于图们江北岸红旗河下游的这个乡，今有11个行政村、16个自然屯，人口近5000人。

开拓初期的1895年，清政府在延边地区设“越垦局”时，此地曾为“崇化社”，后与“崇善社”合并，改名为“崇善”，直至如今。

在此文中，笔者想分民国和伪满两个时期，略述崇善乡的去过去实情。

一

民国时期，今崇善乡划为1个社（崇善社），辖2个甲和25个村屯。居民有340户、1700人。其中，汉族仅有60户、约300人。当

时，地方官厅在比设巡警局、统税局、保安团和缉私队等统治机构。崇善社社长，先后由朴昌熙、李钟学和姜元浩等朝鲜人地方绅士就任。甲长则由蔡仁默、朴熙淳和李文成等朝鲜人担任。崇善地方屈指可数的中国人地主，有孙兰芳、王宪、魏木生、张世璋、朱光戌和李忠贵等。

民国地方官吏与这些当地中国人地主以及朝鲜人头面人物相互勾结，独揽一切权力，残酷剥削和压迫了这里的贫苦农民。他们榨取当地农民特别是朝鲜人农民膏血的主要手段，就是征收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使得农民们喘不过气来。那时，把给中国人地主当佃农的朝鲜农民称“付户”，而崇善乡境内的朝鲜农民大都成了这样的“付户”。课税项目，除每个“付户”一律缴纳的“付户税”外还有老人的“付户”和每年5元钱的“发髻税”，办婚事的人家有10元钱的“婚姻税”，养牛的农户则有“牛头税”和“牛车税”。尽管食盐（亦称“官盐”）每每供不应求，却一但发现购买从朝鲜进来的私盐者就不由分说以“走

私犯”捉拿严办，还罚以重金。若被缉私队抓去，就无异于遭了一场横祸，须交“门槛税”和“绳税”（解开缰绳之后收的税）各1元钱外，还得交纳巨额罚金。“付户”李延七因购买两碗“私盐”，被罚款200元之多。按那时的行情，用这笔钱足能买到4头役牛。李延七只因那两碗遗恨难消的“私盐”，终于倾家荡产了。“牛税官”的敲诈勒索，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牛税官”主要征收家畜税。母牛生一头牛犊就要交5元钱“牛头税”，领取一张“牛票”。每年还要交1元钱的“牛车税”、0.50元的“爬犁税”。甚至还要交“背架税”。“牛税官”们每次到村里征收这些税款时，总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凭空捏造种种搜刮之由，鱼肉乡民。有一次，一个“牛税官”到金和家收“牛头税”时，拿牛的毛色找“茬儿”，无理刁难。那家伙硬说现在这牛的半黑色，同“牛票”上注明的“半乌色”不符，一口咬定是“私买的牛”，喝令要罚款。金和觉得很冤枉，可强忍着心中的愤怒，以好言说情。然而，“牛税官”干脆不予理睬，盛气凌人地呵斥道：“想在这块土地上活下去，就得

乖乖地纳税，不然马上滚出去！”金和再也忍不住，扑上去把那家伙揍了一顿。这下，可闯了大祸。金和卖房子卖牛，还向村里人借钱，好不容易凑500元罚金交上去，才算保住了自己的性命。金文益因无力交清滞纳的税和罚金，流着泪卖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当时，崇善一带曾流传这样一句话：“见官吏就得脱帽行礼，刚买的草帽不到一天就破，新棉帽也戴不了一冬天。”这虽然是夸张之词，但农民们处于何等可怜境地，官吏们的权势又何等不可一世，足可见一斑。

那年月里，勾结地方官府的中国人地主，一旦声称“这地方就是我的！”，就可以凭土地执照，能随意强占朝鲜移民用血汗开垦出的沃土。从奉天（今沈阳）来此地的孙兰芳，就是靠这种手段独占广坪，一朝成了“占山户”。广坪的100余户农民都变成了孙兰芳的佃农。垦荒3年后，孙兰芳就开始毫不客气地以“4：6”分成，占有了当年的收获。后来，孙兰芳成了拥有360公顷耕地和700公顷森林的大地主。他豢养守护自家庄院的20多名私兵，领近穷苦的老百姓谁也不敢贸然去他家门

前。崔振权、韩龙俊、崔文极和金盞律等移民，是赤手空拳来芦田洞定居的。他们从落脚后的第一天起，就借地主的粮食过日子。从此，年年累死累活地干活，也还不清地租和那一碗米要一斗谷的阎王债，只好用草根、树皮来糊口。吃的如此，穿的和住的就更不用说了。那时的佃农们大都搭起木刻楞房或窝棚过日子，身上穿着麻布衣就算是高级了。大部分人披个“三丁”或狍子皮、狗皮。韩龙云的妻子连这样的衣服也没有，整天猫在家里不敢出门。

二

伪满时期，崇善村（相当于今崇善乡范围）包括石人、百里、诗满、玉石、元峰、南夕、崇善等8个原朝鲜移民村和上天、下天、顺兴、罗山、东京、广坪等8个朝鲜人开拓团部落，约1700户（含中国人60户、开拓团移民300户）、8000人口。崇善是当时的村驻地。这里有伪满洲国的基层统治机构“村公所”和“警察署”，有“协和会分会”和“武装自卫

团”，还有“税关”、“专卖分局”等。此外，隶属于“朝鲜总督府”的“朝鲜人开拓团”总部盘踞在东京部落里。

崇善村里，有臭名昭著的金松今等6名地主和20多名富农，占据全村大部分沃土。崇善村的伪满洲国基层官吏、警察、走狗、自卫团头目、“开拓团”职员、地主、富农只有70余人，加上他们的家属，也不到崇善村总人口的10%。然而，他们却残酷剥削和压迫占全村人口90%以上的穷苦百姓。

1943年，日寇从朝鲜以欺骗手段弄来的移民们新建的“朝鲜人开拓团”部落的情况，更为悲惨。“开拓团”部落里，有10余名从“朝鲜总督府”领取薪水的“开拓团”团长、指导员和治安员等职员，还有正、副部落长。他们不仅拥有生产、行政管理权，还单独设拘留所，行使司法权，伪满地方官府和警察署，也不敢惹他们。一到春天，他们每天凌晨3点就吹起床哨，把10多岁的少年到60多岁的老人都集中到一起点名，分给每人吃点粥，又吹哨将这些人驱赶到地里干活。被人们称为“倭寇”的朝鲜人团长，经常骑着日本军马到处转游，

严加监督。1944年夏季的一天，这个家伙路经上天部落时，看到一些在家里做家务的妇女，便肆意打骂，把她们都赶到地里干活。任基淳的妻子背着小孩儿锄地，致使可怜的小孩儿，在三伏天中暑，不几天就夭折了。一到农忙季节，“开拓民们”顶着星星下地干活，背着月亮才回到家里，胼手胝足，辛勤劳作，3年间开垦出“东京坪”的400公顷土地和“上、下天坪”的30公顷土地。

“开拓团”部落的农民，即使是在冬季也不能得闲。他们按照上头的“严令”，每天每人编一张椴杨木席子。3年间，他们虽然交了数千张席子，但分文酬金也未见到。在忍饥受冻终年苦役的“开拓民”中间，蔓延很多传染病。那时候，身无分文的人们，一染病就眼睁睁地等死，传染病对他们来说犹如洪水猛兽一样可怕。仅上天一个部落，就有5个人未曾吃一包草药，离开了多灾多难的人世间。

“开拓民们”失去生活的希望，陆续逃离这人间地狱般的“开拓团”部落。那家伙便象疯狗一样到处搜捕，一但捉住就关进拘留所里，杖打棍杀一顿毒打，熬不过酷刑，发誓不

再逃跑者，才让其家属用牛车把人拉走。

崇善村的地主、富农榨取当地农民的膏血，也不比“开拓团”的倭寇逊色多少。最恶毒地剥削当地农民的家伙，就数恶霸地主金松今。他是大地主金官世的次子。这个本来就恶名昭著的纨绔子弟，曾打死一名筏木工后，畏罪逃到和龙的。他依仗着在龙岩坪拥有大量土地的其父的权势，曾在崇善村当过“自卫团”团长，也当过警察，成了日寇的忠实走狗。1937年，金松今放弃在日伪机关的差事，继承其父在龙岩坪的30公顷土地和18头耕牛后，便开始残酷剥削当地农民。那时，龙岩坪里有18户（后增至21户）佃农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金松今靠恶毒的手段，在佃农们的血泪和尸体上积累了自己的财富。在短短的8年间，他便拥有40公顷土地、200公顷森林、80头耕牛、1²只鹿和3栋大房子，娶两个小老婆，一跃成了山村的大地主。

金松今持有各具不同用处的3把手杖。每年两次赶着满载各种糕饼、肉食和酒的牛车，去警察署的时候，他就手执“八角手杖”，迈着四方步显耀威风。每当警察来到龙岩坪时，

他就让全村21户佃农凑些鸡、鸡蛋之类乡村的上等食物，来“接待客人”，自家却一毛不拔。他惯用这些手段，巴结了“酒鬼”警察署长朴春奉、“馋猫”日本人警尉有马、“大棒”警长池田等。

1939年，龙岩坪的众佃农实在不能忍受金松今的压迫和剥削，准备一起移居他处。警察署接到金松今的告急报告，即派池田等警察。他们如狼似虎地闯进村里，不问青红皂白，见着佃农就毒打一阵。赵星烨被打得遍体鳞伤，当场昏死过去。

金松今无偿使唤佃农们时，挥舞里边藏有利刃手杖，这时，他那吸血鬼的凶相，便暴露无遗。1937年初冬，在给自家大院和仓房周围筑起一道围墙时，他就挥舞着这把刀手杖，将刚刚打完场的18户佃农强行赶往大雪覆盖的深山密林里，硬使每户伐采6米长的原木28根，凛冽的寒风中，有不少只穿麻布单衣或围麻袋片的佃农冻伤了手脚。

农忙季节里，强迫佃农下地做庄稼活时，金松今就用了尖上带有铁钩的手杖。每年春耕时，他天不亮就起来，象丧家之犬逐一遛进佃农

家院里，用这手杖的铁钩勾住门把，用力拉开后，闯进屋里劈头盖脑地用手杖打醒还在睡觉的庄稼人，赶到地里去干活。他就用这把手杖，把产后仅有20天，且又病又饿而躺在炕上的金光弼之妻赶到地里锄草，使他淋了一场雷雨，病情恶化，含恨离开了人世。

每年打场时，金松今不仅派二地主金宪龙，就连自己的小老婆都派上用场，凶神恶煞般地强征佃租。1944年，朴于文夫妻租种金松今的8000坪耕地，秋天打了6000余斤粮。然而，扣出佃租2400斤、“出荷”粮2500斤、牌长谷（为牌长每年交10斗粮食）150斤、“牛头税”300斤，就只剩下650多斤粮。此外，又还清头年向金松今借的15斗谷，加上利息5斗，共20斗、300斤粮食。结果，从初春开始，辛苦劳作得来的只是300余斤谷子。全家7口人，还不够吃2个月。安正基家有6口人，打完场就断粮，只好靠山菜和树皮搀些大麦熬成的稀粥延命，全家人满脸菜色，浑身浮肿，不成人样，其惨状目不忍睹。

金松今在龙岩坪榨取农民们膏血的9年间，在21户佃农中，患病后连一次也没请大夫

号过脉而死去的就有15人。

压迫与剥削愈甚，反抗愈烈。崇善村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也从未停息。有一年冬天，佃农们团结起来，在伐木场狠狠揍了一顿金松今的二地主。诗满上村农民李成淳则用玻璃瓶砸了屯长的脑袋。1940年，一支抗日武装部队在红旗河畔的一次战斗中，一举歼灭日军“前田”中队和其他“讨伐队”后，崔得吉等村里的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加抗日武装部队；李在洙、宋允善等人主动为抗日部队当向导，积极运送了作战物质。崇善村贫苦农民通过抗日部队的宣传，坚信日寇和地主、富农的末日已经不远，翘首期盼解放的那天。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喜讯终于传到了崇善村。然而，光明的新曙光尚未照进崇善这个穷山僻壤。光复后，伪满统治时期欺压在工人头上的“61木材株式会社”职员金昌日，趁社会秩序尚在混乱之际，拿掉“村公所”旧牌子，挂上“区公所”新牌子，当上了区长。恶霸地主金松今则和伪满警察朴尚东相互勾结，在原“警察署”里拼凑所谓“自治队”，当上了头目。金松今腰里佩带驳壳枪和

日本军刀，骑上军马，到处耀武扬威，以“维持治安”为幌子大搞强盗行径，和从前一样压榨了龙岩坪的贫苦农民。

就在这时，中共和龙县委派工作队进崇善村，深入了解这里的情况，发动了贫雇农群众。1946年秋，终于在崇善小学操场举行了清算恶霸地主金松今和区长金昌日罪行的群众大会。过去象奴隶一样受苦受难的贫雇农们争先上讲台，愤怒控诉了这两个人间魔鬼的滔天罪行。会场上，“要把恶霸地主金松今枪毙！”的呼喊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经过人民群众的庄严审判，金松今终于结束了其丑恶的一生。金昌日和朴尚东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日本鬼子火烧三道沟

赵育民 颜景厚 口述
胡寿春 整理

1931年“9·18”事变后不久，日寇派兵进驻和龙县三道沟（今和龙镇），住在东兴合的一个大院里。不过头批鬼子来的不多，只有几十个人。

那时和龙地区到处熊熊燃起抗日斗争烽火，成为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根据地。这里既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一支部队，又有中共和龙县的抗日游击队，还有一支号称救国军的“大刀会”人马。

1932年农历5月13日，“大刀会”的几百人从东南岔方面出发，来进攻驻三道沟的日本鬼子。这支队伍没有快枪等新式武器，因火力弱些，打了半天没能攻下来，然而鬼子兵看

到“大刀会”人多势众也没敢出来。“大刀会”不打鬼子兵营，又转攻东烧锅（酒厂），想弄点粮食和枪支；可是烧锅闭门不开，打不进去。烧锅人却从炮楼上开枪打死了一些“大刀会”的人。他们一看情势不妙，便退走了。

第二天，鬼子扬言“中国人都是大刀会，统统不是好人”，把三道沟正街东西两面的房子都放火烧毁，化为灰烬。这时老百姓早就都吓跑了，躲在东山上的颜景厚看到街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又是惊恐异常，又是万分焦急，眼巴巴地看着自家房子被火舌吞掉。

那时三道沟只有200来户人家，而整街从南到北的100来家全被烧光，只剩下一堆堆余灰和一座座破房框。这一场大火还使附近的民房也变成了一片火海。那天，烧完街里又到南台子（和龙镇西南山岗上）烧了四、五家农民的房子，使好多农户也遭到了火劫。

日本鬼子不仅烧房子，还见到中国人就杀。吓得人们慌不择路，跑的跑，藏的藏，各自纷纷逃散。

有孩子的女人和老年人行动不便，只好就地想法躲避起来。三道沟正街有一个叫张连祥

的，那天他老婆带着一个小女孩，同左邻右舍的十几个人藏在一个家的菜窖里，被鬼子兵发现了，这些毫无人性的家伙竟用机枪往窖里扫射，十几个人被打死了，唯有张连祥的小女孩只伤了手指，爬在她死去的妈妈身上嚎哭不止。

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大烧杀之后，隔了一些日子，正街的老百姓含着怨、忍着恨又偷偷地陆续回来，收拾自家残垣断壁，修成临时遮风挡雨的住处，重新过起了十分艰难的日子，

那年头，人们的生活本来就难以维持，又突然遭受日本鬼子这场洗劫，更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了。至今，当年经历这场灾难的老人们，回忆起这件往事，无不痛斥日本侵略者，在三道沟犯下的野蛮罪行。

“日野骑兵第十团”二三事

李惠文 口述

张 霁 整理

在和龙头道沟地面上，曾一时飞扬跋扈、胡作非为的“日野骑兵第十团”其实并不是日本鬼子的部队，而是由一群投降，一说劝降的和一些零散土匪拼凑的强盗队伍。只有团长一个人姓日野，故称“日野骑兵团”。日本侵略者网络这一伙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拉起一支汉奸队伍，只不过是他们耍弄“以夷制夷”的阴险伎俩，妄图以中国人打中国人罢了。

1934年“日野骑兵第十团”由延吉进驻头道沟。这个骑兵团一到头道沟就犹如遇见凶神恶煞，街上几乎断了行人。骑兵团的兵无不非常野蛮，只要见到不顺眼的人，就不问青红皂

白，都抓去铡草或清理马厩。谁要逃跑，抓回来就挨一顿皮鞭，打得皮开肉绽，才算罢休。这伙儿强人土匪本性依旧，随意闯入平民百姓人家，抢人东西，弄得家家户户闭门不出，大姑娘更得东躲西藏，全头道沟百姓人心惶惶，过上了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

“日野骑兵团”的军马所需草料，都是老百姓分摊，团部经常派兵催着要草料，人们只得如数缴纳免得惹麻烦。这些兵们从来不铡草不喂马，尽让抓来的人干这些累活脏活，后来抓不到人，就向街道上的各家各户摊派。

有一次，骑兵团的匪兵出来抓铡草的人，看到镇兰街安画匠在门口坐着，就逼着他去铡草。安画匠说：“我得病刚好，浑身无力，不能干活。”这群匪兵不由分说，就把安画匠摔倒在地，毒打了一顿。有病刚好的人哪能经得住这场折磨。安画匠当即卧床不起，几天后含恨而死。

那年春，“日野骑兵团”派两个匪兵到头道沟西延安屯的张全智家“买”马草。张全智见这两个骑马匪兵进院，不敢怠慢，赶紧出屋迎接，知道领头的是个姓韩的班长。问明来

意，韩班长说是“买”马草。张全智当然心理清楚，“买”是假，要草是真的，便一口拒绝，说只有点准备苦房子的草，不能卖。这韩班长带着兵，回到团部以实禀报。团部又派4个匪兵，疾驰到张全智家里，把他五花大绑押进“日野骑兵团”团部里。众匪徒张口就说：“骑兵团要点马草，你不想给，就是反满抗日分子！”虎狼设围了上来，又是拳打脚踢，又是一顿皮鞭马棒将张全智打得死去活来，直喘粗气。可是，这伙匪徒还不肯罢休，一会灌辣椒水，一会又压杠子，整整把他折腾了5天。后来，张家礼请头道沟市面上有名望的商号——天泰德的黄财东、五兴北的刘财东和永兴和的张财东等人，联合到“日野骑兵团”团部，替张全智求情。日野团长看了这些人的面子才放了人。

释放张全智是有条件的，应允给日野送一匹枣红高头大马（其实是日野主动要的）还要给骑兵团5000捆稻草。这还不算，以在饭馆里摆了5桌，叫“日野骑兵团”排长以上军官饱餐一顿，才算了事。

这伙匪徒在头道沟驻防期间，欺压百姓的

许多事情，至今人们记忆犹新，倘或说起来无不痛恨之至。

后来，“日野骑兵团”转驻安图县十骑街（今合新乡驻地）头道沟的人们才出了一口舒坦气。据说，这“十骑街”之名，就是因为“日野骑兵第十团”曾在此驻扎而得名的。

不久，“日野骑兵第十团”又移驻三江省佳木斯一带，与我抗日联军作战，全团覆没，无一逃生者，真乃大快人心之事也。

延安村的一次兵匪之乱

张 怀 刚

1932年12月的一天早晨，于殿阳被一伙土匪当绑票劫走了。这件事，一时成了头道沟地区的头号新闻。

于家大院在今龙门乡延丰村二队原属头道镇延安村，于殿阳是这一带财主。那天早晨，于殿阳的大儿子于庠起床后，到厢房拿米做饭，猛然看到一伙土匪闯进院里。再往前走几步，他便看到其父蹲在仓房后面，原来早已进院的土匪已把于殿阳绑了起来，旁边还站着一个匪徒，不准他乱动。这时，院里的土匪们慌忙把于家里细软之物抢出来，胡乱装到马车上，逼于殿阳也坐上去，套上马拉走了。

于庠见事不好，马上叫出3人去追赶。土匪朝他们打了几枪，他感到人少力薄，只好返回来。于庠到刘学勤（于家北面过河约

一里的刘家大院)求援,找来了刘之德等3人,随后他又到阎家大院告急,正巧阎永祯从八家子回来,带了6名自护家兵,于是,他领着这些人急忙朝小烟沟追去。同时,于殿阳的二儿子于海,奔跑到头道沟,向驻军吴营部报告了匪情,要求吴营长设法将其父救回来。没想到,吴营长一反往常,非常爽快地答应他的请求,立即召集各连长开会,决定派出2个排。这2个排的士兵乘坐3辆马车,离开头道沟直奔小烟沟。当他们赶30里路,来到小烟沟岭时,与刘家和阎家的护家兵相遇。两路人马合在一起,简单商议了一下战斗方案,便分头占领前方制高点。不一会儿,他们攀到山岗上,居高临下,往山谷一看,只见沟里有4户人家,于殿阳和土匪们正在一家院子里烤火,有几个匪徒已进屋,看样子是准备打尖。

吴营2个排士兵一边朝匪徒们放枪,一边从山上往下跑,刘家和阎家的护家兵则沿着山谷往前追赶。可是,当他们打到沟底那4户人家近处时,土匪们早已跑到森林里,只躲在旮旯里发抖的于殿阳。由于没能消灭匪徒,再加上自

己的1名士兵被土匪打死他们，索性放一把火烧毁4户民房，使无辜的老百姓遭了殃。刘、阎两家的护家兵在追赶途中，拣到了土匪扔掉的一支枪。

这支枪后来还有纠纷。刘、阎两家的护家兵说是他们拣到的；吴营的士兵却一口咬定是他们缴获的；各自相争不休，终究还是吴营的势力大，枪也不拿出来；而驻延吉的驻军团部又根据吴营的战况报告，饬令缴获的“2支枪”一律上交，不得迟误。两家的护家兵无奈，不得不各自抽份子买了一支枪交上去了事。

吴营战死一个兵，把“绑票”抢了回来，吴营长可有话说了。他对于殿阳说：“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却死了一个士兵，你就得破点财，怎么也得好好发丧。丧事嘛，最少也得办3天。”接着，吴营长开了3个长长的货单：1口上等木料花头棺材、8头大猪、200斤烧酒、500斤大米、300斤白面、50箱香烟。听说于殿阳操办这丧事所花的款项，是忍痛卖了几垧好地才支付的。

吴营长当然也不放过趁机捞点油水的机

会。他向头道沟工商业者发“讣告”通知各有钱的财主们，都来营部吊唁。那些吊唁者送来的礼品和现钱，不用说大都进了吴营长的腰包里。于殿阳自然更要献这个殷情，他率他的几个儿子，召人抬着供品，摆在灵堂前，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以表救命之恩。前来驻军营部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兵营变成熙熙攘攘的闹市，一连三天大摆筵筵，那些丘八爷们一个个酩酊大醉，东倒西歪，丧事成了他们的喜事；而那些有头有脸的工商业者虽不能在营部里吃喝，都到馆子里尽情享用，尽欢而散，一时轰动了整个头道沟。到了第三天头上，才抬棺送葬，锣鼓喧天，唢呐奏乐，好不热闹。

至此，这场兵匪之乱才算收尾。有人说，于家在匪乱之后花在“兵灾”上的钱，如果用来赎票可节省许多，也能省去许多烦恼之事，于殿阳也甚知是这么回事，却只好忍了，有口难言，自忍晦气而已。

日伪时期的“救济会社”

程学文 张靖 提供

张作臣 综合整理

1931年，悍然发动“9·18”事变、侵占东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采取种种罪恶手段，榨取了东北各族人民的血汗。所谓“救济会社”，就是他们实行这种殖民统治的工具之一。

“救济会社”实属臭名昭著的《东洋拓殖株式会社》，政治上受龙井日本总领事馆领导；经济上经营金融业务。它美其名曰：“救济会社”其实并非救济机关，而是挂羊头卖狗肉，专干骗人、坑人、吃人的勾当。它的贷款对象，是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广大各族人民。倘若一些工商界人士经营资金拮据，或黎民百姓遇有意外变故，急需款项时，可向“救济会社”借贷。那时借贷都是金票，就是日本帝国在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金票1元相当于吉林

的永大洋1元5角。向东拓株式会社的“救济会社”借贷，不需要人，也不需要担保人，只需以凭证抵押。工商界人士借贷，多以工商股票抵押；广大农民借贷，则以土地执照作押，因利息极高，一借贷便成还不清的阎王债。结果，上当吃亏的自然是中国工商界人士和民众。

记得有一年，粮豆价格偏高，一石黄豆（320斤）吉林永大洋7元，“救济会社”以原粮价向工商界放贷。第二年粮食价格跌落，每石降到吉林永大洋2元6角，“救济会社”反而以现粮价收粮替代本息，从中渔利，坑害借贷人。不消说众多穷苦农民，连许多“占山户”（地主）也因此而破产。头道沟的杨谦一武佐臣；龙水的李福顺，倪集隆和龙井的马士凤等人的土地，都被“救济会社”夺去。那年月里，“救济会社”以诸如此类的欺骗手段，致使民众陷入窘境的事例，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标榜的“救济会社”之狰狞面目。

整理者附言：

（此稿系根据吴育森先生文稿加以综合而写成的）

日伪时期的“出荷粮”

孙洪运 口述

张作臣 整理

“出荷粮”是日本侵略者逼迫农民强行征收的粮食。每年深秋打场时节，日伪区公所、村公所的官员警察，倾巢出动，到各家各户翻箱倒柜，搜刮农民隐藏的一点粮食，不完成“出荷粮”上交任务，就休想过安稳日子。头道沟延安村里曾发生过因“出荷粮”逼死人命的事情。

1939年腊月的一天，一伙带枪佩刀的警察，突然闯进头道沟西不远的延安村查粮食，逼交“出荷粮”。当他们搜到孙长发家时，一个日本人警察走进厢房，一眼看到房梁上挂着猪头和猪下水。那年头即使是自家饲养的猪，也不能随意宰杀。鬼子警察朝孙长发翻

了白眼，蛮横地嚎道：“吧嘎呀噜(日语：混蛋之意)！你家杀猪的不行，猪肉的统统拿来”。那年，孙长发老人60多岁，膝下3个儿子都去五道扬岔搞冬采，家里男人只有他一个。孙长发一辈子没曾遇到过这种阵势，吓得直发颠并说：“这猪肉，不是我放的，不知道。”鬼子警察气势汹汹地说：“你的不知道，你儿子知道吧？让你儿子回来！”老人更加害怕一声也不敢再吱声，双腿直打哆嗦。

这伙警察又去粮食仓库搜查了一番，让孙长发第二天送去10麻袋稻谷。10麻袋稻谷，这是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啊，家家都缺粮，他一个穷老汉到哪里弄这么多的粮食？蛮横不讲理的警察扬长而去后，孙长发失神发呆了，久久坐着哀声叹气。当天傍晚做饭时，孙长发的儿媳进仓库，吃惊地看见她老公公已悬梁自尽。

1944年是日寇最后垮台头一年，疯狂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走投无路，临近末日，更加穷凶极恶了。那年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极为奇缺，粮食更加紧缺了，日本鬼子强迫农民交“出荷粮”也就逼得更紧了。秋收时节，不准农民把稻子往家拉，

全堆在水田地里。村公所的人和警察硬逼农民在地头平脱谷场，就地打场之后，装上麻袋立即运走。这期间身挎洋刀的警察一直在场院监视着，督促农民日以继夜地干完。

一天夜里，没有一丝风，延安村的张全义老人守在场院里等着有风扬场。警察叫他扬场。张全义老人说了一句，没有风扬不了。可是警察不管有没有风，还是硬逼他快扬场。张全义老人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解释无风不能扬场的说话声自然稍大了些，那个警察顿时瞪起双眼珠子，气势汹汹地举刀向老人砍去，张全义老人被砍了两刀，一气之下卧床不起，再没起来。

这年，延安村农民总共交了82吨稻谷，还是没完成“出荷粮”任务。人们终于醒悟到：既然终年辛勤劳作，还是吃不上大米，干脆不种水田为上策。于是1945年，这里的大部分农民不愿意再种地了，大片水田没有人种，都撂荒了。但是可恶的警察并不让人闲呆着，他们抓不少庄稼人到五道扬岔搞“勤劳奉仕”，炼松根油直至“8·15”光复。

青 山 里 大 捷

金仁哲 金石

1920年10月下旬，由洪范图、安武、金佐镇等人指挥的延边地区各反日武装部队，在和龙县西北部山区进行联合作战，抗击入侵的日寇；取得了凤梧洞祝捷之后又一辉煌战果，在我省乃至东北朝鲜族人民反日武装斗争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篇章。这就是后人有口皆碑的“青山里大捷”。

在事隔70多年的今天，当事人都已作古，很难找到亲历者。本文仅据文献资料和亲见、亲闻者的口碑资料，略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日军的入侵延边和反日武装部队的联合转移

1920年6月，日寇在凤梧洞战斗中惨败后，才以延边地区反日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而大吃一惊，不得不另眼相看。日寇头目终于醒悟

到，只靠龙井总领事馆的武装警察和少数部队的短时间越境追击的应急手段，是对付不了日益壮大的延边地区各反日武装部队的力量。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根本性对策，遂着手制定“剿讨”延边地区朝鲜人反日武装力量的计划。

同年7月16日，驻朝日军参谋长大野、关东军代参谋长贵志等军界及领事馆高级官员，又聚首于沈阳，进行所谓“第三次奉天会谈”，拟定了《间岛不逞鲜人剿讨计划》（以下简称“剿讨计划”）。在此之前，“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赤地等人，奉第三任总督斋藤实的指令，亦曾到中国的东三省，同沈阳、吉林等地日席头目密谋策划，并同东北军阀张作霖相互勾结，进行所谓“中日联合搜查”，大肆镇压东南满各地的朝鲜人反日运动。“中日联合搜查”，在南满地区颇有进展，迫使西路军政署部队不得不撤离通化、柳河地区，向安图奶头山转移；但在东满地区，因吉林省原省长徐鼎林不予合作，无甚进展。不久，徐鼎林因此而被罢免，由张作霖的心腹、吉林督军鲍贵卿兼任省长，才有些进展。延边地区局势渐趋紧张

起来。

日本政府按“剿讨计划”，向中国当局公然提出向东北地区出兵的要求。中国政府自然表示严正拒绝。几经外交途径反复交涉，亦未能达成协议。于是，1920年9月12日和10月2日，日寇一手制造两次“珲春事件”，终于寻到了大举出兵的“借口”。10月17日，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通告”：自10月17日始，日军出兵我国东北地区，“讨伐”那里的反日武装力量。其实，早在10月3日，日军已迫不及待地出兵珲春，接着进犯汪清和龙井地区。以驻朝日军第19师团为主的日寇，分三个支队大举入侵了中国领土。与此同时，从分苏联沿海州撤退的日军第14师团所属部队南下；出兵辽东方面的关东军部队也东进，形成四面包围延边地区各反日武装部队的态势，总兵力为2万5000地余人。

面对着这一严峻的形势，延边地区各反日武装部队，陆续转移到和龙县西北部山区，以迎接新的斗争。

其实，洪范图将军在凤梧洞战斗后不久，就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准确地预见到日军必

将大举入侵 延边地区，一场恶战不可避免，①遂率领“独立军”部队，于1920年8月初离开延吉县依兰沟（今属延吉市），经老头沟、明月镇，于8月底转移到和龙县卧龙沟之北卧鹿沟山林地带，加紧进行各方面的战斗准备。

这一事实，首先由洪范图将军亲手写的《日志》②可以证明，其次由当时分别在二道沟明岩村、卧龙沟北卧鹿沟村和渔浪村桐花洞亲眼见过洪范图和“独立军”部队的梁焕俊、③金极星、④柳德奎⑤等老人，也都十分肯定地作证。

安武等人率领的国民会军和新民团、义军府、韩民会、光复团、义民团等其他反日武装部队，亦随后集结于二道沟、三道沟和卧龙沟地区，以临战姿态，进行了各项战斗准备。头道沟日本领事公馆于1920年10月13日，向龙井日本总领事馆的报告《关于马贼非法韩人团行

①《现代史资料》第28卷，350页

②《洪范图日志》第20页

③梁焕俊，原明岩村人，当年11岁，现住延吉市。

④金极星，原卧鹿沟人，当年13岁，后住延吉市。

⑤柳德奎，原渔浪村人，当年10岁，现住延吉市。

动之件》里，清楚地记载过这一事实：⑥日寇头目从其他各种渠道获悉的许多情报，也都证明这一事实。这里摘引其中的两段记述：

“…据10月14日接到的情报，洪范图之部约800人，现驻和龙县三道沟黑瞎子沟里，每天进行军事训练，并从二道沟方面征收小米、烟叶、草鞋等。目前，洪（范图）之部下者，尚多散驻于二道沟一带。”⑦

“与日军抗御的不逞团（指朝鲜人反日武装团体——编者）之主力，系洪范图及安武率领的部队和韩民会等，共约500人，到10月中旬，每人携弹药200发，军粮将分到7日量…”⑧

这就能够充分地说明，洪范图、安武等人指挥的“独立军”联合部队，约比北路军政署部队早1至2个月集结于青山里战场。

北路军政署部队转移到和龙县三道沟地区，是总裁徐一、司令官金佐镇等人，接受洪范图的建议之后，采取的行动。它的先遣队600人，名为“旅行团”，由研成队长李范爽

⑥《现代史资料》第28卷，393页。

⑦同上书，第395页。

⑧同上书，第404页。

任“旅行团长”，于9月20日离开汪清县西大坡，10月5日抵达和龙县卧龙沟，而金佐镇率领的北路军政署大部队，迟于10月16日才抵达和龙县三道沟附近，是最后集结于青山里战场的一支队伍。

战前的敌我态势与作战部署

1920年10月中旬，在和龙县西北部山区集结的延边地区各反日武装部队，有洪范图的独立军部队，约300人；安武的国民会部队，约250人；义军府部队，约150人；韩民会部队，约200人；义民团部队，约100人；新民团部队，约200人；光复团部队，约200人；金佐镇的北路军政署部队，约1800人（含家属及非战斗员1200人）总计3200余人。

与上述反日武装部队对阵的，是按照“剿讨计划”，担负“丙区”（和龙、龙井、局子街即延吉地区）“讨伐”任务的驻朝日军第19师团第37旅团所属部队，简称“东支队”（因陆军少将东正彦指挥，故有此称谓），包

包括第37旅团司令部，步兵第73联队、步兵第74联队第2大队、骑兵第27联队全部、野炮兵第25联队第1大队、工兵第19大队第3中队以及第19师团直属部队和宪兵等，总兵力为4000余人。

1920年10月20日前后，在和龙县境内东至二道沟，西至蜂蜜沟，南至三道沟之青山里，北至古洞河畔之五道阳岔的狭小地区里，敌我双方7000余人的武装部队，以不共戴天之势相遇，一场鏖战实属不可避免。

为了胜利进行这次抗击日寇的战斗，洪范图亲自指挥的独立军部队与安武的国民会部队、义民团部队，韩民会部队，新民团部队等5支反日武装团体的领导人，于1920年10月13日，在和龙县二道沟附近举行联席会议商定，组成“联合部队”，推举洪范图为总司令官，并作出了统一各部队作战行动的“五项决定”：

“…

1、上述武装团体的军事行动，均须听从统一指挥；

2、凡加入并登记于国民会者，必须即刻动员他们按预定部署就任，尽职尽责；

3、立即着手征收军粮和军需品；

4、组织侦察队，秘密派遣到各个方面，探知日军之动态；

5、与日军交战，须避实击虚，或诱至深山峡谷之中，务求必胜，其余不可恋战。

...” ⑨

在洪范图将军统一指挥下，组成独立军“联合部队”之后，义军府，光复团2支部队与之会合，总兵力达1400余人。洪范图的独立军“联合部队”与金佐镇的北路军政署部队之间，未能组成统一的作战指挥部。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统一作战指导思想和战斗行动，洪范图提出了正确的对敌方略和作战方针。简略地说：它包括两个要点：一是，必须认清与日本侵略军的一场激战，是不可避免的，宜主动迎战，不宜取被动的避战策。二是，必须在有利的时机 有利的地点，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一举歼敌的情况下，方可出其不意地迎战，速战速决，切不可恋战，打胜了就走。“青山里大捷”之实践证明，洪范图将军构想和提出的策略思想和作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⑨《现代史资料》第28卷 402—403页

但是，洪范图的这一正确主张，由于北路军政署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极力反对，虽经10月初⑩和10月16日⑪两次联合作战会议商讨，均未被采纳。

10月19日，日军“东支队”的先头部队，已逼进和龙三道沟，咬住北路军政署的后续部队，双方交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紧急关头，洪范图，安武等独立军“联合部队”和北路军政署部队的领导人，聚集在和龙县三道沟附近的庙岭，再次召开了联合作战会议。这次会议上，北路军政署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才不得不放弃避战策，接受洪范图的主张，商定利用青山里和卧龙沟附近的有利地形，突然打击来犯之敌，遂研究了具体作战方案。按照作战部署，洪范图指挥的独立军“联合部队”设伏在卧龙沟北侧的卧鹿沟附近密林中；由金佐镇指挥的北路军政署部队则隐蔽在青山峡谷里，引诱日军先头部队，一举歼灭。实际上，

⑩《现代史资料》第28卷，407页。

⑪同上书381页，或慎全康著《韩国近代民族独立运动史研究》313页，又一说，第二次联合作议日期为10月10日，参见尹炳石著《独立军史》180页。

这一任务，是“旅行团”（亦称第二梯队）600名勇士们，在研成队长李范奭等人的指挥下完成的。

敌军方面的作战部署是：东正彦少将把进攻金佐镇率领的北路军政署部队的任务，只交给山田大佐指挥的第73联队，而进攻洪范图统一指挥的“联合部队”的作战行动，则由他来亲自指挥，并且出动了包括步兵第37旅团司令部、步兵第74联队第2大队、骑兵第27联队全部以及野炮兵、工兵和第19师团直属部队在内的所有主力。

显而易见，东正彦少将把这次“讨伐”的主要目标，指向了洪范图统一指挥的独立军“联合部队”。10月18日，离开龙井的东正彦再三核实各方面的情报，确认洪范图的独立军“联合部队”驻卧龙沟附近之后，把自己的总指挥设在渔浪村里，遂作了企图一举消灭的战斗部署。渔浪村离洪范图的独立军“联合部队”埋伏的北卧鹿沟，近在咫尺。

主要战斗经过

“青山里大捷”，是指1920年10月21日至

26日，在和龙三道沟青山里附近和卧龙沟北侧山地及古洞河畔的五道阳岔等地进行的大小10余次胜利的战斗。本文只略述其中的几次主要战斗经过。

1、10月21日的两次战斗

10月20日，北路军队政署部队经青山里、甄峰里、抵白云坪。金佐镇率领的第1梯队朝右侧山沟深入，隐蔽在白云坪北面鸡冠砬子上；李范奂等人指挥的第2梯队600人，沿海兰江上游继续西进3—4华里，抵达一个叫“直沼”的地方。

从英额岭发源的海兰江流到这里，直泻而下，形成一汪池水，因得此名。传说，当年伐木工人曾在这里扎放过木排，如今却看不到一点“沼”的痕迹。这里正是巍巍的甄峰山（亦称枕头山）东北侧脚下，两侧只有很陡的山坡，却是深山峡谷，有一条林间小路（当年连牛马也难行，如今能通汽车）伸向沟底。两边的树林里，既易于埋伏大批将士，又利于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而中间的峡谷非常窄小，进到这

里的敌人一旦遭到袭击，就无法展开战斗队形，只得处于被动挨打的窘境，是个十分理想的阻击战场。李范石与众人商议，便在这里设伏，严阵以待，熬过了霜降前寒冷的夜晚。

10月21日上午，太阳升上东山岗足有丈把高，敌步兵73联队的先头部队约200人，由安川少佐指挥，毫无戒备地列纵队进入伏击圈里，遭到北路军政署第2梯队600名勇士的阻击。战斗不到30分钟，便胜利结束。敌先头部队大部被歼，而北路军政署部队只牺牲20人，重伤3人，轻伤数十人，可谓令人鼓舞士气的胜仗。这便是“青山里大捷”之首战。

同一天下午，洪范图指挥的独立军“联合部队”，也在渔浪村北卧鹿沟，同另一支日军主力展开了激战。东正彦少将无法准确判断出洪范图部隐蔽的确切位置，只好下令各交通要道上配置机枪，并在怀疑为反日武装部埋伏之处放火烧山。后来，日军主力部队分两路，沿着南北卧鹿沟，向洪范图“联合部队”坚守的高地，发起了进攻。

洪范图打破常规战法，把预备队放在中央高地，而自己率主力部队埋伏在侧面高地上。

果然，敌军把中央高地当作主攻方向，猖狂地冲了上来。预备队勇士们毫无畏惧，顽强反击，战斗在对峙状态中持续到天黑。这时，洪范图命令预备队火速撤离中央高地，绕至侧面高地，从背后袭击敌人，而绝对不可暴露行踪和意图。预备队撤离不久，一支日军部队占领了中央高地。敌人果然中了洪范图的换位之计。于是，占领中央高地的敌军，不仅遭到独立军“联合部队”主力的正面反击，而且还遭到预备队的侧后袭击和另一支日军的夹击，付出了伤亡400余人的惨重代价。

上海《震檀》杂志曾详细报道这一战斗时称，洪范图的独立军“联合部队”一举歼灭日寇1200余人^⑫，显然是大为夸张的。但是，北卧鹿沟之战，乃为“青山里大捷”中主要的一次胜仗，则是不可否认的史实。

2、10月22日的两次激战

白云坪直沼战斗结束后，北路军政署部队第2梯队将士们连夜行军80华里，于10月22日凌晨2时半许，抵达卧龙沟甲山村。率领第1

梯队，比他们先到那里的金佐镇获悉，在离甲山村不到30里的泉水坪，头天夜晚进驻日军的一个骑兵小队，⑬遂决定予以歼灭。

第2梯队勇士们立即急行军，天亮前赶到泉水坪，向熟睡的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袭击。战斗很快结束，敌4骑侥幸逃脱，其余全部被歼。然而，这次突袭战却导致了异常严重的意外后果。李范石从缴获的敌军作战文书中猛然发现，敌魁东正彦少将的总指挥部就设在离泉水坪不到20里的渔浪村，不禁大吃一惊。刚刚结束的泉水坪之战，不啻是虎口抢肉，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场恶战就在眼前。他即刻下令，争分夺秒，抢先占领泉水坪东北方向的野鸡沟东侧高地。不一会儿，东正彦的主力部队果然朝着野鸡沟涌了进来。就这样，泉水坪之战犹如捅了一个大马蜂窝，引起了渔浪村北侧高地上的一场鏖战。

北路军政署部队第2梯队勇士们，靠占据的有利地形，拼死迎击敌人。但是，战斗一开始，就对我十分不利。东正彦象输红了眼睛的

⑫《现代史资料》第28卷，349页。

⑬本文从《独立新闻》（上海发行，1920年2月25日第4版）之报道。

赌棍，孤注一掷，亲自督战，倾巢出动骑兵27联队、野炮兵和工兵，配合步兵发起攻击，丧心病狂地冲击山头。

不久，金佐镇率领的第1梯队也赶来参加战斗，却因无实战经验，非战斗员居多，无济于改变战局。北路军政署部队的勇士们面临危机，视死如归，虽英勇顽强地抗击装备上、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且战且退。

这时，突然从右侧对面山头上传来密集的枪声，正朝着高地冲上来的日寇兵纷纷倒了下去。敌我之间的激战态势，一下发生了急变。原来，是洪范图率独立军“联合部队”赶来支援的。洪范图指挥独立军“联合部队”，在北卧鹿沟战斗中重创敌军主力之后，经得味洞，向西北转移途中，从慌忙逃离战场溃退的北路军政署部队的士兵嘴里得知，日军将在渔浪村北山围攻金佐镇部队的急报，便立即调转行军方向，火速赶来参加战斗。他们和北路军政署部队互相配合，从两面打击敌人。东正彦少将再也无妙计可施，战斗从早晨持续到天黑。夜幕降临后，东正彦下令所属部队撤回鸡

南村和渔浪村一带；反日武装部队也未追击退走的敌军。在这天的战斗中，日军伤亡500余人；反日武装部队，特别是北路军政署部队的伤亡也很大。这是“青山里大捷”中的又一次主要胜仗。

3、古洞河畔的反夜袭战

10月22日的激战后，参战的反日武装部队各自分散撤退。考虑到今后行军、作战的需要，洪范图将“联合部队”化整为零，分成原来的7支队伍行动。

10月24日和25日，洪范图率原独立军部队300余人（因走散的北路军政署部队官兵30余人自动加入，总兵员反而比战前增多），在天宝山南侧峡谷中，袭击并重创日军守备队之后，于25日傍晚，折回了古洞河畔的五道阳岔附近。

这天深夜，日军步兵少佐，饭野大队长率领的“东支队”所属一个搜索队，发现洪范图部队的踪迹后，偷袭了他们的宿营地。但是，敌人偷袭不成，反倒陷入了绝境。洪范图早已

洞察敌人的意图，将计就计，遂在宿营地近处设伏，燃起篝火，造成假象，引诱敌人，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夜袭战。当时，朝鲜军司令官以电文致日本帝国陆军大臣的战况报告书《朝特120号，“东支队”战斗详报》^⑭里，颇为详细记述这次战斗前后过程，是一篇饶有兴味的反面史料。日军的《间岛出兵史》里，也有关于这次战斗的记载，现摘引其中的一段文字：

“…25日夜12时，进行夜袭，虽击退敌人，却因敌众分散隐蔽在各处，继续向我乱射，为避免无益之损失，将兵力集中于附近的最高峰1743高地”^⑮。“后来，审问俘虏才得悉，敌众系洪范图指挥的约300人和金佐镇之部下约30人，只因（我之）兵力不久，未能彻底剿讨，于26日返回蜂蜜沟。”^⑯

日寇头目按照惯例，在这里也胡乱掺和了假话和真话。夜袭洪范图部队的露营地，扑了一场空，是真话；所谓“击退敌人”，是假话。受到散在各处的独立军将士猛烈射击，又是

^⑭《现代史资料》第28卷226—227页。

^⑮古洞河畔没有1743高地，从比例尺为1：5000的军用地图上看，应为1143高地。

真话。实际情况是：进入埋伏圈里的敌军2个小队（约100人）被全歼，其余敌人魂飞魄散，筋疲力尽地爬上古洞河畔的1143高地，“望见东边天上，渐渐出现鱼肚白”，“脸上才显出喜悦之色”。他们由于惊魂未定，眼看着就在近处徐徐远去的“洪范图及其幕僚，亦未有追击之念头”。^{①⑦}这就是持续6天的“青山里大捷”中的最后一个胜仗。

据史料记载，在“青山里大捷”中，日本侵略军的损失为死亡者有联队长1人、大队长2人，其他军官和士兵1254人（含敌人之间互相残杀者500人），负伤者有官兵200人^{①⑧}。另一资料称，“敌军被歼灭的总数为1200名，朝鲜军敢死队战死者为200名”。^{①⑨}

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历史档案资料里，自然查不到他们在青山里战斗中惨败的具体记录。然而，当地人民群众却是目睹过日军在青山里战斗中惨败的狼狈相的见证人。“青山里大捷”

^{①⑥}参阅金正珠编《日帝统治史》，或《间岛出兵史》上第58页。

^{①⑦}《现代史资料》第28卷，226—227页。

^{①⑧}同上书342页。

^{①⑨}上海《震檀》杂志（1920年11月14日）

后不久，有一位叫李衡权的青年农民^②，在和龙县头道沟镇的亲眼见过日寇搬运战死者尸体的情景。这里，引用一段他回忆的原话：

《庚申年，我已19岁了…那年9月中旬的（阳历10下旬）一天，我有事到头道沟去，就在日本领事分馆门前，看到6辆中国人的大马车停在马路上，约摸30多人的日本鬼子兵护送着这个奇特的车队。我擦身经过马车旁边，车上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

第一辆马车上，放着一个人的尸体。有一个士兵举着阳伞遮阳光，还有一个军医坐在旁边。死者的胸部缠着绷带，浸出的血迹早已干涸。一看是个致命伤。

第二辆马车上，放着两个人的尸体。有两个士兵各撑一把阳伞遮着阳光。

第三辆马车上，也是两具尸体，但没有撑着伞的士兵。

第四、第五、第六辆马车上，全是堆得很高的小木箱子，为不让它掉下来，用绳网

^②李衡权，1902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明川郡，1905年随父母迁居和龙县大砬子，3年后移居头道沟东兴洞。采访时，住延吉市。

罩着。一辆马车足足能有好几百个那样的小木箱子。

人们都悄声议论，那些小木箱子里，是被打死的日本鬼子脑袋。我也马上猜知是那么回事。……”

如上所述，日本侵略者们在青山里战斗中，遭到了比凤梧洞战斗中的失败更惨重、更可耻的失败。这是狂妄的侵略者们玩火自焚，自食其果。这一永垂青史的辉煌胜利，是延边的朝鲜族人民和反日武装部队的勇士们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红旗河畔两次胜仗

郭永馨

1934年秋，日本侵略者向渔浪村抗日游击根据地连续“讨伐”，给这里的抗日武装斗争造成了极大困难。渔浪村成了不能久留之地，中共和龙县委决定转移。那年12月和翌年1月，在渔浪村的县委机关、抗日部队和当地居民分两批转移到安图车厂子（今和龙县和安村），继续坚持了抗日游击斗争。

日本侵略者恨不得一口吞掉车厂子根据地，又进行了残无人道的“讨伐”。1935年农历8月，敌人调集数百名兵力，东从五道杨岔（原新兴部落，今已成废址），北从十骑街（今安图县新全乡）、西起安图（今松江），三面合围向车厂子扑来。二军第一师、抗联第二团和县抗日游击队，在军长王德泰的指挥下，同一团联合作战，抗击来犯之敌，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之后，主动撤出了车厂子根据地。1935年

3月，根据东满特委第一次联席会议“关于取消各县委组织的决定”中共和龙县委建制被撤销，原和龙县委书记曹亚范被调任东满特委秘书长，县委其余人员和所剩3个支部的20名党员，均归安图二委。

1935年10月，二团离开车厂子根据地，转战于五道杨岔一带，后进入奶头山，开始了开辟新的根据地。1936年3月抗日二团在敦化县迷昏阵（现属安图）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不久又改为第六师，转战于长白山西南林海。从此，东北抗日斗争中心，由东满转移到南满。1939年6月，二方面军又转战到和龙县，在兀奇江（红旗河）战斗中，一举歼敌50余人。

马鹿沟战斗

1940年3月11日，抗联一路军第二方面军主力，到马鹿沟附近活动，侦知驻马鹿沟的敌人只留20余名森林警察守卫，大部人马去青山里“讨伐”尚未归来。第二方面军指挥员决定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吃掉马鹿沟之敌，遂下令

指战员在大马鹿沟树林里隐蔽，做好战斗准备。当天夜晚9时许，第二方面军勇士们两路进攻敌人阵地。一路从大马鹿沟西南出发，进攻敌西山炮台和兵营；另一路过河占领东北山上的炮台，控制公路，阻止森林警察队逃窜。我军以一个连的兵力，袭击敌警察本部，一举消灭全部守敌，并解放了300多名采伐工人。

这次战斗抗联第二方面军缴获敌机枪1挺、步枪20多支、子弹10余箱、军装100套、白面700余袋和不少的军需品。

红旗河战斗

1940年3月13日，抗联第二方面军主力在马鹿沟一战奏捷后，转移到安图县花砬子密林中休整。恼羞成怒的敌人，出动“讨伐队”追击第二方面军主力，扬言要一举消灭。3月25日第二方面军主力根据敌人的动态，撤离花砬子，到大马鹿沟河上游（距今和龙林业局长红林场西12华里处）的西北沟。是日晨，第二方面军的警卫连和机枪排，埋伏在峡谷北部高地南坡上，居高临下，控制小路，七、八团主力则

顺着小路埋伏在对面山路的树林中，对敌形成了南北夹击的阵势。

下午5点左右，从花砬子方向追击我军的敌先遣队顺小路进入伏击圈，日寇总指挥前田指挥的“讨伐队”130多人也跟了上来。我军指挥部一声令下，部队指战员们便集中火力射向敌群，日寇“讨伐队”总指挥官前田当场被击毙。敌军立时溃不成军，乱成一片。敌副总指挥泉水急忙收拾残军败卒，妄图向我北山高地上南坡阵地冲锋。当敌人气喘吁吁刚爬到山腰时，只听一声霹雷般的呐喊，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震撼峡谷。敌人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紧接着喊杀声四起，我军战士们猛虎般地冲下山来扑向敌人，展开了白刃战，以疾风扫残叶之势很快消灭了全部敌人。

这次战斗中，我军竟无一伤亡，击毙敌人100多，俘虏20余人，缴获机枪6挺，步枪100余支，手枪30余支，子弹数百发，和大批军需品。

至今，在和龙林业局长红林场场部西12华里的西北沟里，有一条小河自西北流向东南，汇入大马鹿沟河。河右岸有条小道，是进出山

谷的必经之路。在北山脚一小石砬子下面，尚有日本侵略者竖立的“前田中队激战之地”石碑碑座，碑身“文革”期间遭到破坏。

“德化事件”

卢维发

1945年8月，在光复后最初一段日子里，和龙地区的社会秩序尚未安定，曾处于混乱状态。本文叙述的“德化村事件”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里发生的。

同年8月18日，以和龙清湖村大地主门德昌、周喜昌为首的伪满时期的地方头面人物，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开始纠合敌伪残余势力和地主、流氓以及部分落后群众，拉起了一支队伍。8月20日，他们正式成立了“和龙市地方治安维持会”（以下简称“维持会”）。“维持会”的委员长，由门德昌担任，副委员长由大地主李永春担任，下设总务部、民生部、交通部、宣传部等5个部。总务部部长为刘振涛、民生部部长为牛青山、交通部部长为李信、宣传部部长为杜维详、保安部部长为周喜昌。

“维持会”还管30余人武装人员组成的1个大

队，下设3个中队；第1中队长为刘长安，第二中队长为常福学，第3中队长为门长山。

“维持会”的核心为保安部。这一伙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沓渣，在门德昌、李永春、周喜昌等人的策动下，蓄意制造民族分裂，大肆枪劫民财、民物，疯狂阻挠和破坏和龙“劳农青同盟”的建立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同年8月下旬，德化村的南坪屯也成立了以孙子玉为会长，赵文和为副会长的“德化治安维持会”，人数约有300~400人。同年9月，德化村朴在汉（原地下革命者，后叛变，伪满时曾任龙渊学校校长），韩元根（伪满时德化村副村长兼国安助理员）发起、成立了“劳农青大同盟”。他们二人与“延边劳农青总同盟筹备委员会”的池喜谦和苏军司令部的崔大尉（即姜信泰）取得联系，并汇报了“和龙市治安维持会”到德化村活动的具体情况。

10月27日，延边劳农青总同盟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延边委员会建议，将“总同盟”改称“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通过“大同盟”的14条纲领和成立宣言，选举组成了以池喜谦为委员长的执行委员会。11月初（农

历9月下旬)的一天,参加这次会议的朴在汉和韩元根从龙井回来后,也想把原德化村“劳农青同盟会”改为“民主大同盟”,遂召集了筹备会。会议开了3天。第三天头上,即1945年11月6日(农历10月2日),在德化村南坪明伦学院教堂里,由朴在汉和韩元根主持召集了吉地、柳新、柳洞、龙渊、大渊、车厂、庆兴、芦果、东坪、西湖、竹林、梨树、新丰、釜洞、南进、南坪等16个村的代表和南坪的群众近500人参加的会议。正式成立“德化村人民民主大同盟”,选出朴在汉、韩元根、崔日龙、柳青松、俞东云、金允哲等人为执行委员。会议传达了“延边民主大同盟”的14条纲领和成立宣言。

德化村治安维持会会长获悉筹建“民主大同盟”的消息,就去和龙向维持会汇报情况;副会长赵文和也在南坪写信向孙子玉汇报了那里的情况。

“和龙市维持会”的门德昌、李永春即向龙井苏军警备司令部谎报情况,妄称:“日本战败兵在南坪聚众闹事”。

11月6日(农历10月2日)门德昌下令

门长山率数十名武装人员和1名俄语翻译李荣昌（系门德昌家油坊的雇工），配合由龙井苏军司令部派来的4名军人乘一辆汽车车上架着一挺轻机枪离开和龙向南坪急驰。

当汽车途经车场村时，他们强行撤掉哨卡，并解除了武装。上午10点左右汽车经柳洞村时，他们也照此办理，拆除并收缴了哨卡的电话机而后直奔南坪。柳洞村哨卡还有一台备用电话机，没有被他们发现柳洞村的“民主大同盟”会员，即用这部电话机往南坪通话，报告了刚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正在南坪主持会议的朴在汉认为，既然有苏军前来，就不会出什么事，继续主持开会，并派人去吉地村请宋老汉来当俄语翻译，准备欢迎苏军的到来。中午时分，会议暂停，一多半人去吃饭，剩下的人在教堂里等着欢迎苏军。

“维持会”的武装人员和4名苏军军人乘坐的汽车，在南坪伪警察署门前停下。“维持会”的武装人员下车后，直奔伪警察署仓库去抢枪。可是，砸开仓库门后发现里面没有一支枪。于是，他们又上车，到了明伦学院教堂。由2名苏军军人和“维持会”的武装人员包围

学院教堂，另2名苏军军人和翻译李荣昌进到教堂里。李荣昌和苏军军人说了几句俄语，便从腰间拔出匣枪喝道：“不准动！”，坐在前面的朴在汉等人站了起来。苏军军人看到金允哲胳膊的袖标上有一行“民主大同盟”的俄文字样，便阻拦李荣昌不要开枪。但是，这家伙不听劝阻开枪击中了金允哲的双眼。朴在汉和韩元根看情势不妙，纵身跳窗逃跑。苏军军人看有人跑掉，立即朝空鸣枪警告，却已无济于事。场上的100余人早已乱成一团，纷纷往外跑去。这时，“维持会”的那些家伙们朝跑散的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9人、重伤2人。

朴在汉、韩元根和一些群众，从教堂跑出后渡过图们江到朝鲜暂避一时。几天后他们二人从朝鲜返回南坪，经勇化到龙井，向龙井警备队（原龙井别动队）报告了“德化村事件”的详情。11月9日（农历10月5日）延边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姜信泰，由延边民主大同盟的朴根植陪同，率全允弼为队长的龙井警备队20余人来到和龙，将“维持会”会长门德昌、副会长李永春、保安部部长周喜昌和李荣昌等5人逮捕，同时下令解散了反动的“维持会”。

11月中旬（农历10月中旬），姜信泰司令员和全允弼率领的龙井警备队把李永春和李荣昌押回和龙，在新东学校操场召开了公审大会，恶贯满盈的李永春被愤怒的群众乱棍打死，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接着，姜信泰等又到南坪村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维持会”是反动组织，应立即解散，同时建立了“民主大同盟”组织。从此，和龙和德化地区才有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秩序。

文本材料提供者：

许永淳、徐案宪、崔日龙、赵文和

参阅公安局〈清查档光〉61、64号全宗

和龙县人民在解放战争中的贡献

郭永馨

和龙县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朝鲜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30年代初，在中共东满特支领导下，这里的人民曾举行过“秋收暴动”（1930年）和三道沟“907”农民暴动，日本侵略军侵占东三省以后，和龙县人民在中共和龙县委领导下，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先后创建平岗、药水洞、卧龙渔浪浪村，牛心山牛腹洞和车场子等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曾出现过渔浪村“13勇士”。

1945年光复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派一批干部来这里之前，全县人民就自发地行动起来，纷纷成立“劳农青妇同盟”（后改为“民主大同盟”），开展革命斗争。同年10下月旬，中共延边委员会派崔时英组建中共和龙县委，11月中旬，来自延安的云青等人到和龙正式成立和

龙县委。从此，和龙县各族人民在县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清算、剿匪、建政斗争，翌年春至1948年4月的两年间又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彻底摧毁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翻身做了主人的和龙县各族人民，以极大的热情保卫胜利果实，踊跃参军参战，全力支援解放战争。

和龙县各族人民早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前就争先报名参军。仅1946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的20多天时间里，全县青壮年参军的就有1536人，到1949年6月中旬，全县已有6320多名青年参军奔赴前线，在火线上为国捐躯的烈士达865名。同时，广大群众还参加各种战勤工作，支援了解放战争。仅1947年至1948年的两年间，全县就动员民夫11449人次，动员马牛车1174辆，担架980副，直接到前线参加了战斗。此外，全县人民动员起来，送往前线作战部队的各种物资和慰问品更不知其数。和龙县战勤队，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随军转战在东北各个战场，出色地完成了抬担架，抢救伤员和运输军用物资等任务。两年时间里，在参加战勤工作

人员中，荣立特等功1人次，一等功200人次，二等功251人次，三等功454人次。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独立九师政治部奖给和龙县十一大队“战勤模范”奖旗一面。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部给和龙担架队授与“无上光荣”锦旗一面，表彰了他们的功绩。

1948年9月中旬至11月初，在东北野战军发动举世闻名的辽沈战役期间，和龙县人民担架队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大队的240副担架，1690名战勤人员，相继开赴战斗第一线，随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转战于长春、开原、铁岭、抚顺、彰武、通辽、阜新、义县等地，不避艰险，更不畏困难，英勇战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和龙县担架队第十一大队，被参战部队称之为既是担架队，又是工作队。担架队员们进驻解放区抚顺期间，为当地群众医治疾病、帮助农民打场、打柴、挖井、编织草鞋、积肥、开荒种地，和解放区人民一道努力恢复生产，积极支援前线。部队首长称赞他们是战勤模范，也是爱民工作的模范，受到了部队党委的嘉奖和当地群众的好评。这里还应插上几句为宜，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和龙

县的革命烈士2464人，其中朝鲜族人2435名，占98.8%。

总之，和龙县各族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用他们的辛勤劳动，更用他们的生命，为全国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文参考资料

- ①《和龙县土地改革概况》
- ②《和龙县文物志》
- ③《和龙县地名志》

贞孝公主墓志并序

夫细览唐书妣沛降帝女之滨博详丘傅鲁馆开王姬之筵岂非妇德昭、誉名期于有后母仪哉。余庆集于无疆衮祉之称其斯之谓也公主者我

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之第四女也惟

祖惟父王化所兴盛烈戎功可得而论焉若乃乘时御辩明齐日月之照临立拯握机仁均乾坤之覆载配重华而商夏禹陶殷汤而辑周文自天祐之威如之告公主禀灵气于巫岳感神仙于洛川生于深

宫幼闻婉柔环姿稀遇擘似琼树之繁花瑞质绝伦温如昆峰之片玉早受女师之教克比思齐每慕曹家之风教诗阅礼辨慧独步雅性自然？好仇嫁于君子标同车之密义叶家人之永贞柔恭且都履慎谦，箫楼之上韵调双凤之声镜台之中舞状两鸾之影动响环珮留情组绶黼黻至言琢磨洁节继敬武于胜里拟鲁元于豪门琴瑟之和菰蕙之馥谁谓夫先聿化无终助政之漠稚女又夭未延弄瓦之日公主出织室而洒泪望空闺而结愁六行孔备三从是亮学恭姜之信矢衔杞妇之哀凄惠于圣人事怀闾德而长途未半隙驹疾驰逝水成川藏舟易动粵以大兴五十六年夏六月九日壬辰终于外第春秋三十六溢曰贞孝公主其年冬十一月廿八日己卯陪葬于梁谷之西原礼也皇上罢朝兴恻避寝弛悬丧事之仪命官备矣挽郎呜咽遵阡陌而盘桓辍马悲鸣顾郊野而低昂喻以鄂长荣越崇陵方之平阳恩加立历荒山之曲松楸森以成行古河之隈泉堂邃而永医惜千金于一别留尺石于万龄乃勒名曰不显烈祖功等一匡明赏慎罚奄有四方爰及君父寿考无疆对越三五囊括成康其一惟主之生幼而洵美聪慧非常博闻高视北禁羽仪东宫之姊如玉之颜舜华可比其二汉上之灵高唐之精婉齐之态闻训兹成嫔于君子柔顺显名鸾鸞相对凤凰和鸣其三所天早化幽明殊途双鸾忽背两剑永孤笃于洁信载史应图惟德之行居贞且都其四愧东中詠爱栢舟诗玄仁匪悦白驹疾驰奠殡已毕即远灵輻魂归人选角咽茄悲其五河水之畔断山之边夜台何晓荒陵几舜森古树苍野烟泉崑俄必空积凄然其六

贞孝公主墓志并序

郭永馨 译

回想过去读过的《尚书》(尧典即曾说), 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降临妫汭水畔(嫁给了虞舜)。细读《左传》(曾云), 鲁庄公在鲁馆为周天子的女儿主持婚宴, 难道这不是以显赫的妇人道德把声誉留给后人, 端庄安祥地为人母者的典范, 使先人留下来的恩泽永垂后世吗? 沿袭这种福祉指的就是这个啊! 公主是大兴宝历孝感金轮圣法大王的第四个女儿, 其祖先父王倡导淳朴的风俗, (他们)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和烈烈战功无与伦比, 顺应时代, 处理政事的业绩如同日月光照天下, 树纲纪, 固社稷, 施仁政, 堪与虞舜媲美, 更与夏禹相肖, 受殷汤之陶冶, 谋周公之韬略, 得天之助, 望重事青。公主承受了巫山神女之灵气, 感受了洛水女神的德行, 生长在宫廷内, 从小就懂得温柔的妇德, 秀丽的容貌是鲜见的, (她的)光彩就象琼树上的繁花, 高洁的品质是无可相

比的。温柔的姿态就象昆仑山上的一片美玉，很早接受了女师的教化，严格约束自己，看到德行高的人就想学的象她一样，经常仰慕曹大家班昭的风度，努力阅读诗书，喜欢遵循礼仪制度。（她）聪明过人，高风俊节，自然无缺。公主有个好配偶，她嫁给一位君子，（他们）标示着夫妻间亲密的仪表，合谐的美德。公主温柔漂亮，谦逊谨慎，在箫楼上，他们吹奏着吸引双凤的曲调，在镜台中，映出夫妻俩鸾凤般的舞影。丝带上的环佩叮咚作响，衣着服饰十分讲究。她玉口一开，总是文雅得体的至言，反映她那修养高尚的情操，如同敬武公主佳于胜地，又象鲁元公主居于豪门，夫妻如此和谐，感情如此融洽，谁料夫婿早逝，未能为国家尽瘁，小女儿又夭亡，未能活到女红之年。公主走出卧室，哀痛地流着泪，望着寂寥的空闺凝结着愁绪。然公主遵循六行始终不渝（西周大司徒教民的六项行为标准：即孝、友、睦、姻、任、恤《周礼地官司徒》一译者注）；唯恪守三从，视为亮节。（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译者注）学和恭敬姜女之信节，缅怀杞妇之凄怆，从父王那里得到恩惠，

从不忘怀做妇人的道德。然公主在人生的道路上，尚未走上一半，竟去而不返，如同大河的流水把藏在沟壑里的(舟楫)冲走一般。公主终于大兴五十六年六月九日壬辰时死在宫廷外的住所，享年三十六岁；为之谥号贞孝公主，是年冬十一月十八日己卯陪葬于染谷西之台地上（染谷西：两山中间的流水道西侧——译者注）礼成。

皇上无心执掌朝政，悲痛大哭，睡不安寝，丝竹逆耳，办理丧事的礼仪事宜已命属下准备停当。唱挽歌的人哽咽抽泣，沿着田间小道徘徊不前，（驾着灵车的）辕马环顾田野，高低不停地悲嘶哀鸣。象鄂长公主那样，公主丧葬的哀荣超越于崇山峻岭，此之平阳公主那样，将灵柩暂厝以待遵礼安葬（暂厝：临时把棺材停放在什么地方，以待改葬——译者注）。在荒山转角的台地上，松楸茂密成行，在溪水湾之旁，筑墓穴于地下，深邃荫翳，痛惜公主永别，为留下墓碑永远纪念她，遂镌刻了墓铭。墓铭称伟大显赫的先祖功在一统天下，赏罚严明，德贯天下。愿君父之治，愿君父万寿无疆，万世永存，比赶三皇五帝，凌驾成康二王，此

其一也。公主降生，自幼洵美，聪慧非常，博识远瞩，为宫廷之表率。为太子之姊，容华如玉，可比薔花（花：一词双关，既象薔花那样美，又象落花那样朝开暮谢，仅荣一瞬——译者注）此其二也。公主承汉水之灵秀，袭高堂之精气，原为美好的姿态，再接受良好的教育，滋育而成。她嫁给一位君子（旧时指品德高尚很有学问的人——译者注）温柔恭顺，显名内外。象鸳鸯一样结侣成双，象凤凰一样和谐歌唱，此其三也。夫婿早逝、生死殊途，象一对恩爱的凤凰背向飞去，象一对雌雄宝剑各居一方，公主矢志守节，载之史册，绘制图象，信守妇德，坚贞不渝，此其四也。公主愧对《桑中咏》这样诗篇（夫妻衷情绵绵），喜爱《柏舟》这样诗篇（忠贞守节），公主这样仁人竟遭此不幸，流光飞驰，葬礼已毕，灵车归途，“魂归人逝”，哀乐悲沉，此其五也。在溪水之滨，断山之旁，墓穴何时重见光明，荒野里不知（要呆）多少年，古树荫翳，云雾迷茫，墓门一闭，徒聚凄伤，此其六也。

注：为读者方便，上下文之间译者在（ ）加上原文省略的词语，以免误解。

略谈渤海与唐王朝 文化上的亲缘关系

郭永馨

渤海贞孝公主墓碑，是目前仅见的第二块渤海石刻文字（第一块是贞惠公主墓碑）。它的发现，是我州考古工作的一个重大成果，对研究渤海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最直接、最确切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从贞孝公主墓志并序一文中可以看出，渤海国与唐王朝文化上的亲缘关系是极其密切的。

渤海建国后，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极力效法唐朝，积极吸收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很快，至第九代王宣王时期，国力空前强大，被誉为“海东盛国”。渤海国共传14世，历时229年，最盛时期“地方5000里，户10余万，胜兵数万”，设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渤海国时期和龙全境属中京显德府管辖。和龙县西古城就是渤海国的城池。唐代天宝年间，即渤

海大兴五年至大兴十九年(742—756年)的15年间，渤海王都(文王钦茂)，统辖六州：显州、卢州、铁州、汤州、荣州、兴州。渤海中京地区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腹地之一，渤海的遗迹遗物遍及和龙县全县境内，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繁荣景象。

贞孝公主墓碑的发现是渤海历史考古的重大收获。1949年，在敦化六顶山渤海墓群发掘的贞惠公主墓内发现了墓碑，但因墓被盗，墓碑被打成7块，三分之一的字迹斑驳脱落难辨，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贞孝公主墓碑，全文字迹清晰，与贞惠公主墓碑对照校勘，两个墓志内容只有6句有所不同外，句句相同。于是便可依据贞孝公主墓志去补足贞惠公主墓志斑驳难以辩认的脱落文字，使贞惠公主墓志全文可读了。这对研究渤海历史，尤其对研究渤海的文化与唐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贞孝公主墓志通篇宣扬的是儒家思想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墓志把国王歌颂为“仁均乾坤”、“明齐日月”、“玄极握机”、“明赏慎罚”之圣主，承虞舜夏禹殷汤周文之明，“越三五囊括成康”。由此可见，渤海国王崇尚

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就是儒家的仁孝，和封建伦理道德。三皇五帝夏禹商汤周文成康均为国王学习的楷模。对公主从思想和行为规范上，则要求“克比思齐”，“敦诗悦礼”，“柔恭且都”，“六行孔备”，“三从是亮”，“恭姜”，“杞妇”都是公主做人的榜样，学习的楷模。可见整个碑文通篇浸透着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总而言之，儒家思想成为渤海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圣君贤人成为渤海人学习的典范。儒家宣扬的三皇五帝之世，则是渤海政权、渤海贵族追求的政治理想。

贞孝公主墓志对于研究渤海的文学与艺术，研究渤海文学与中原唐文学的关系也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贞孝公主墓志文完全符合中原通行的程式，有序有铭。序文记述公主一生的行状，铭文对公主标示赞颂和悼念。序文可分四段：以尧女王姬之妇德女仪为导言，总领全文为一段：叙述公主高贵的出身为二段：三段主要叙述公主的气质、外貌、教养、出嫁一直写到夫妻恩爱，丧夫夭女，矢志守节和谢世；四段主要讲安葬。铭文则分六段：一为出身，二为慧美、三为出嫁，四为守节，五

为殡葬，六为哀悼。全篇层次分明，结构严谨。

贞孝公主墓志文是一篇典型的骈体文。骈体文本起源于汉魏，形成于南北朝。全篇多为双句（即俪句、偶句），讲究对仗，注重声律。骈体文句式多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世称四六句，是墓志文中最多见的一种句式。除四六句外，还有四字句，四七相间等句式。行文灵活多样，对仗精当，韵脚谐调，辞藻华丽。如“妇德昭昭、誉名期于有后，母仪穆穆、余庆集于无疆”，挽郎呜咽，遵阡陌而盘桓；辕马悲鸣，顾郊野而低昂”。又如：“嫔于君子，柔顺显名，鸳鸯相对，凤凰和鸣”，“禀灵气于巫岳，感神仙于洛川”。全篇句式活泼，行文多样，语言跌宕，顿挫有致。从这些句子可以看出贞孝公主墓志文句显示了相当高的文学造诣，具有鲜明的唐代文学风格。并从墓志中可以看出渤海文学家对儒家经典十分娴熟、许多词句出自《尚书·尧典》、《春秋》、《左传》和《诗经》、《易经》、《礼记》，源出于《诗经》的句子比比可见。作者也非常熟悉《庄子》、《孟子》、《史记》、《三国志》等，对屈原、宋玉、刘向、曹植等历代名作家的作品也是谙练

的。有的从其作品中摄取营养，有的从其佳句中脱化而成，总而言之，从渤海文学家对中原文学的熟悉，醉心和精湛的造诣，可以看到渤海和中原在文化联系上的紧密和深入。渤海人为创造灿烂的民族文化，献出了自己的聪明和才华。

贞孝公主墓志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渤海使用汉字，渤海国是否有自己的文字，现在还有争议，无从可考，但使用汉字已成定论。如果说贞惠公主墓碑的发现已对渤海使用汉字提供了佐证，那末贞孝公主墓碑的发现则进一步证实渤海确定无疑地使用汉字，渤海存在229年间，可能没有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使用汉字记录典章制度和交流思想感情。两方墓碑刻写的汉字已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说明渤海使用汉字由来已久。唐朝大诗人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国的诗篇中出现了“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的诗句（车书本一家：主要说“车同轨，书同文”的情形一笔者注），由此可见，渤海与唐王朝文化上的亲缘关系。（注应该指出，在碑文中有些误写，引用经典亦有不当之处，勿须赘言。）

从协和学院到光兴中学

张怀斋口述

何 庸整理

伪满统治时期，头道沟曾有“协和学院”它是一所中专性质的职业学校开办后，虽由“民办”改为“公办”但却变成日伪实施奴化教育的场所，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光复，后改校名为私立光兴中学。1951年，根据吉林省政府教育厅令，成为公立中学，称和龙县头道第二中学。头道沟改镇后又恢复旧校名，光兴中学，直至现在。

协和学院开办于1938年。当时这里尚无一所中学，头道沟及其邻近地区逐年增多的高小毕业生继续升学颇为困难。众多学生家长普遍呼吁办一所中学，得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声援遂组成“协和学院期成会”推举头道村村长张松年为董事长，韩志坚为副，另设委员若

干名，逐年进行筹建工作。学校开办后，“期成会”改为“协和学院董事会”。由董事会选举张松年为校长、韩志坚为副校长（张松年退任后由周玉昆继任），并聘请李柱极、李根源、韩盛尤、李盛浩、崔永茂、张怀斋、金吉洙等多人为教师，招收朝、汉族学生100余名，分2个班开学。学习课程有日语、汉语、数学、化学、农技牧畜、军体等。校址选定原头道商埠分局办公处（今头道酒厂厂址）。

学校结合课堂教学，进行了农牧业实习。农业实习园地两垧有余，牧畜实习之牛、羊，亦有约数十只。学校经费，因有社会各方赞助和学生缴纳的学费，还较为充裕。

1938年春，学院正式开课后、由于教师施教有方，学生肯于用功，很快形成一个良好的校风，受到社会各方人士的好评。人们赞扬教师为“大马拉小车”，“胜任有余”，称赞学生是“初生虎仔，虎虎有生气”，说学校真有个院校样子。于是，一个好学校的声誉很快传及遐迩，远近皆晓。伪间岛省教育厅闻讯后，曾派员视察过。不料，他们竟于1943年突然下令接管，改学院为“头道农业中学”派来日本

人角田为专职校长，小野为教导主任，连军体教员也是由明月沟特设部队抽调一名军人来充任。从此，“协和学院”的经办权完全落入了日本侵略者手中。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头道农业中学得到新生。头道人民急不可待地聚议聘请校长和教师，很快复课，并改校名为“私立光兴中学校。”

1946年6月，吉林省政府撤至延吉不久，省教育厅长吕良曾到头道视察过光兴中学，称赞学校办得很好，鼓励继续办下去。

1948年公开建党时，学校发展了党员，不久又成立了党支部，是和龙县建立党组织较早学校之一。

随着形势的发展，教育事业的振兴和建政工作的需要，光兴中学的负责人和教师队伍有了很大变动。李柱极调出，先后任和龙中学校长，五高中校长；李盛浩调和龙县政府任文教科长，后任宣传部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不少教师调外市，县任初中、高中负责人，还有些人因自身素质和专长，也分别调离学校。到州和外县市重要部门担任要职，尚记得他们名字

的有太长吉、韩盛龙、崔永茂、金吉洙等。至于农中时期学生，经过土改运动和建党建政教育，成长更快，不少人任县科局级干部，也有些人到外地任要职，他们当中有李青龙、李炳国、南龙郁、李昌洙、许河图；汉族也有武殿邦等。这些师生在各自不同岗位上辛勤工作积极贡献，为光兴中学校史增添了灼灼闪射的光彩。

注：以上资料仅据本人记忆记叙。事隔已有50余年，遗漏、缺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有识者教正。

解放前和龙县天主教和基督教

金熙银

1945年前，和龙县各民族中间传播的宗教有天主教、基督教、耶稣教、佛教、孔教（朝鲜族儒教）等，共设大小教堂30余处，教督2000余人。其中范围广，影响大，信徒多的，还是天主教和基督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我县传播，是从本世纪第二个年代开始的。1914年，德国传教士白德逊在奉天（今沈阳）开办教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德关系有些缓和，德国人可以流传间岛（今延边）。1917年4月，白德逊来到我县头道沟延安息日教会，开展了传教活动。然而，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我县境内开始广泛传播，则与朝鲜移民中的这两教信徒和神职人员越境迁居密切相关的。

现略述解放前我县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概

况。

1、和龙镇（原称三道沟，明信社）。三道沟基督教会，是牧师李应锡为适应传教活动的需要，于1914年创办的，1919年，原和新社救世洞教会长老李文变到这里进行传教活动，发展了很多信徒。1924年11月，长老白斗星、崔德俊、徐昌熙等人先后办了三道沟基督教监理会，大韩（后称东亚）基督教会和安息日教会。1940年5月，伪满洲国政府在新京（今长春）成立满洲朝鲜基督教联盟总会，下设区会和支会，总管东三省境内各地方基督教会事务，强迫各地基督教会合并。三道沟基督教会也毫无例外地面临了这种遭遇。那时的教会旧址，在今和西街教堂，面积为120平方米土木结构，信徒180多人，到1940年，伪满洲国政府强令各地教会，同梵蒂冈、德国、英国、加拿大、朝鲜等外国教会一律断绝关系，并在新京成立了各教会总会。和龙地区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会亦分成第一教会、第二教会，各自进行了布教活动。当时和龙天主教神甫孙洪洙，是从延吉教区派来的。1936年，他在和西街建了座200平方米土木结构的教堂，信徒有

130多人。和龙“东亚基督教会”的前身“三道沟大韩基督教会”，是吴根洙长老于1922年创办的。和龙耶稣教会（汉人基督教会），是安图县明月沟的牧师宋仁山于1930年来此建立的，以西烧锅为活动场所，信徒曾有90多人，到解放为止的长老是刘万辉。

2、 头道镇（原名三河镇，守信社）。1917年4月起德国人白德逊传教士到这里进行传教活动，曾办过“安息日教会”。后来从朝鲜迁来的李龙一、郑玉三、尹泰贤、李相连、文昌周等宗教界头面人物在此创办了天主教会。1928年，德国巴伐利亚州，神甫周成道、毛安世、韩兴烈等人修建一所新教堂，在今头道镇新华街光兴中学处。1937年教会建了一所私立海星学校，8间砖瓦结构校舍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有学生600多名，信徒最多时达433人。“头道沟基督教长老会”旧址在今北山街头道电影院处，拥有3间砖瓦结构200多平方米。据说，这个教堂系长老崔亨哲筹办，李义变长老于1933年，主持修建的，教徒有200多人。“头道沟监理教会”，是郑在德牧师于1922年建立的。“明星村天主教会”，成立于1938

年，会长金京洙，教徒98人，曾有70多平方米的教堂，解放后拆除。1926年11月，曾在头道沟举行“北间岛地方教会”第一次会议，推荐梁柱三为会长，张主变为书记（文书）。

3、西城镇（原称二道沟）。“二道沟基督教会”，是姜益春、梁太化长老于1928年筹办的，历任会长为金万玄、金禹龙、金砚贤等人。教堂面积为180平方米（原乡卫生院处），教徒曾有70多人。“明岩（藏恩坪）基督教会”，是长老梁亨植、李太彦等，于1928年11月5日成立的，受龙井英属加拿大长老派教会管辖，附设教会办的普进学校，学生100多名，信徒70多人。教堂是草房80平方米。

“北大基督教会”，是长老马恩三、会长郑东哲等人在1928年3月1日成立的，教堂面积90平方米，教徒50多人，属头道教区。“邱山（原水城村）基督教会”由朴春协会长负责筹办，于1928年8月成立的，属头道教区，教堂面积80平方米草房，教徒40多人。“鹤保（今龙浦村境内）天主教会”由会长全先九于1936年筹建的，教堂是60平方米的草房，信徒30多人。头道的明星、西城的鹤保、龙门的峰二洞

等，天主教会均属头道教区，由德国人神甫毛安世，每年春秋2次进行巡回各教堂宣讲教义。

4、八家子镇。“救世洞（今丰山村）基督教会”，是长老李宗植、马得万、李兴洙等人，从1920年起开始进行传教活动，于1931年动员教徒进青山沟伐木，流送到本地建5间教堂和周日学校，建筑面积为240平方米，全村70多户人均笃信基督教，亦受龙井英属加拿大长老派教会管辖，解放后拆除教堂，将木料运到殷兴村，建了一所小学校舍。“中南沟基督教会”，是朝鲜咸镜北道明川郡人金宗弼长老，于1924年动员信徒盖教堂，并办一所小学，称普兴学校。1939年会长李炳松在本村中间新盖80平方米的教堂，信徒曾有40多名。当时的该教会成员李殷植老两口，至今还健在。

5、福洞镇（原属矿城村）。“长财基督教长老会”，由会长石云镛于1933年筹办，教堂100平方米，教徒曾有40人。”“杨木顶子教会”，是龙井传教士安顺永于1926年得到汉人教徒单金的协助创办的。

6、德化镇。“龙渊天主教会”，是卢官

会长，动员教徒朴相和等人，于1928年7月29日创办的，教徒20多人，没有教堂的家庭教会，属勇化乡“太阳天主教会”管辖。

7、东城乡。“柳阳（今红星村解放前亦称圣教村）天主教会”，是会长崔承烈于1933年动员教徒自办的，教堂是50平方米的草房，信徒30多人。“碧岩天主教会”，是会长严柱范于1931年成立的，信徒48人，教堂是70平方米的草房。“兴城天主教会”，于1933年成立，会长朴京日，教徒30人，教堂是60平方米的草房。还曾有信教办的一所小学。“鹤洞天主教会”，于1929年成立，会长崔明郁，教徒50多人，原80平方米教堂烧毁，后办家庭教会。旧址地今光东村境内。

8、龙门乡。“峰二洞天主教会”，是于1936年成立，历任会长有崔重华、洪成甲等人，教徒37人，未设教堂在会长家自办，旧址在今长仁村境内。

9、土山乡（亦称和新村）。1932年，牧师郑默德曾在这里进行传教活动，同年长老李炳变创办“盛德长老教会”，信徒30多人，教堂是50平方米的草房，旧址在今水南村境内。

“新兴洞教会”，于1934年成立，会长金恩伯，副会长高明振，教徒26人，教堂是40多平方米的草房，旧址在今官地村境内。

10、勇化乡，（亦称下广浦）。1919年，传教士李允变从朝鲜举家迁到这里定居，便开始在邻近9个自然屯里进行传教活动。翌年他动员信徒建教堂，创办“太阳天主教会”，同时办了一所周日小学，建筑面积120平方米，教徒70人，学生30多名，后任会长为崔石钟。教堂旧址在今新安村境内，原称“对阳屯”。

上述各地教会和信徒，在伪满统治时期均各自进行信教活动，直到1945年解放。经过光复后的清算斗争，尤其是天翻地覆的土地改革运动，所剩无几。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仅有的“和龙县天、基两教会”也遭到洗劫，停止了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宗教信仰政策得以正确贯彻执行，县内宗教活动才正常开展起来。

大 综 教 与 清 波 湖

金石 金仁哲

本世纪第二个年代，和龙县龙城乡清湖村（原名为清波湖，离乡驻地北3.2公里），曾作为朝鲜民族固有宗教之一的大综教总本司所在地，一度成为大综教信徒活动的中心。清湖村东山坡上，至今还保留着大综教三位著名人物罗哲、金教猷和徐一的墓葬，每年时常有人前来瞻仰和凭吊这三位故人。

有关大综教在延边地区活动的史料并不多，它曾在南、北满地区活动的文字记载则更少。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只能略述大综教的始末。

（一）

大综教始于古朝鲜的古神教，原称檀君教。它是崇拜神话中的朝鲜民族之始祖和开国

之勛檀君的宗教。在各历史朝代，檀君教的称谓因人而异。扶余人叫代天教，高句丽为敬天教，白济称效天教，新罗人谓之崇天教(八关会)，渤海人称真综教，高丽人叫王俭教，到了朝鲜李王朝时才名为综教。其间的高丽元宗年间(1247~1260)，由于蒙古侵略者的弹压，檀君教被迫停止布教活动，长达660余年之久。到了李王朝灭亡的前一年，才由第一代教主罗哲倡导，以“檀君教”之名重新问世，后改称“大综教”。

大综教的教祖罗哲(原名罗寅永)，号弘岩，是闻名朝鲜全国的反日活动家。1863年12月2日，生于朝鲜全罗南道保城郡筏桥邑的一个地主家庭里。1894年，他在正式年文科会试中及第，授寝宫注书官之职，两年后，擢升“权知副正字”，他反而辞官归乡，又两年后高宗帝授征税署长之职，亦却之不就。这几年间，甲午农民革命斗争，闵妃事件等外忧内乱不断，国运不及，每况愈下。罗哲痛感国势日趋衰败，百姓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遂心怀救国之志进山修道。10年后的甲辰(1904)年他重新出山时，李王朝更岌岌可危。于是，他不胜忧

慮，广纳志同道合、扶正社稷的人才，结交吴赫和李沂等人士，寻觅救国救民之理。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趁日俄战争之机，公然将侵略魔爪伸朝鲜领土，明目张胆地蹂躏了朝鲜的主权。罗哲与一些仁人志士一道东渡日本，在东京大街上，游说“为了东洋和平，两个民族应相互共存，尊重各自的主权”，并要求会见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然而，伊藤博文等日帝头目不予理睬，把他们拒之门外。罗哲只好快快回国，正赶上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所谓“己巳保护条约”，李王朝遂失去了外交权。罗哲决心暗杀屈从日帝签订这一丧权辱国条约之学部大臣李完用、外部大臣朴齐纯、内部大臣李址鎔、军部大臣李根泽和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等“己巳五贼”。他同吴赫、金寅植等20多人组织“敢死义勇团”，筹措资金，购买手枪，训练团员。他亲自起草同盟书，宣称“为了摆脱套在2000万民族身上的奴隶的羁绊，我们大家要献出生命。”还令李沂拟就“以民族的名义惩处卖国的五贼”的斩奸状。他们本打算各派30名带手枪的行动队，趁早晨打开大门时冲进去，严惩“五贼”，然因缺乏资金，不

能及时购买武器而未遂。后来，他们又准备趁“五贼”入朝之机发动突然袭击。也因“五贼”入朝时间各异而未获成功。于是，他们把炸弹箱伪装成礼物，送给朴齐纯和李完用等人。但是，老奸巨猾的朴齐纯一眼看出破绽，立即通知李完用等切勿打开礼物箱。在此情况下，他们决定分别袭击“五贼”。1907年初，一个叫李洪来的青年，在汉城街上用手枪袭击权重显，可惜只让他受了轻伤。李洪来被捕后，经不起严刑拷打，供出了“敢死义勇团”团员名单和行动计划，18名团员即被捕。罗哲为了减少团员们的无为牺牲，主动投案自首，称自己是主谋者，被判10年刑，同年10月逢特赦获释。出狱后，罗哲变卖所有家产，同吴赫再次东渡日本，四处奔走，向日本的知识界呼吁“阻止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但毫无收效。

罗哲和他的同事们救国救民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又独辟蹊径，执意坚持救国之志。1909年阴历正月15日，罗哲邀集吴赫、李沂、金允植、柳瑾和金寅植等数十人，在汉城聚义，以檀君神话为基础，重光了檀君教。罗哲明确提出，团结朝鲜民族，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就是檀君教的宗旨。檀君教重光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驱逐日帝，恢复国权”，就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这一宗旨。檀君之说，蕴涵着朝鲜民族之魂，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排他性，且男女老幼无不知晓，号召力和影响力甚大。因此，檀君教的活动自然也有日帝头目疾视之虑。于是，1910年8月15日，他们改称檀君教为“大综教”，以避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无端迫害。

“大综教”三字含有“天上大人之教诲”或“欲成天上大人所须知之教诲”之意。它主张人有“三真”、“三妄”和“三途”，圣人能够“感知”、“调息”和“禁触”而一意真行，进入理想世界。它认为这种理想世界不在于遥远的彼岸，而在于吾之精神之内。因此，只要人们虔诚修炼品性，便可达到这种境界。它信奉檀君始祖神的民俗的信仰，以造化神桓因，教化神桓雄，治化神桓俭三位化为一体尊为上帝而加以顶礼膜拜，大综教信徒的寻常活动日，除每星期日举行礼拜外，还有每年1月15日的重光节、3月15日的御天节和10月3日的开天节。

(二)

罗哲重新创立檀君教以后，在汉城齐洞设总本司，积极开展传教活动。然而，日本头目视大综教为异端，横加阻挠和迫害。他们禁止大综教教徒集会，严加调查和限制资金的来源和用途，严密监视教徒们的行动。1910年“韩日合并”后，这种弹压变本加厉，日甚一日，迫使他们寸步难行。第一世教主罗哲，为了摆脱困境，于1911年7月决定把总本世迁至中国的和龙县境内。同年6月，总本世先派教徒李贞完在和龙县鹤城村等地进行传教活动。这是大综教传入中国之始。1913年10月，总本世又派沈权、朴泰益等人在汪清县春阳乡德元里进行传教活动。随后，在延边各地陆续组建教会，为总本司的迁来打下基础。1914年，都司教教主罗哲终于将总本世迁移到和龙县明新社三道沟（今和龙镇）清波湖，开展反日活动。

同年11月，驻龙井总领事馆和头道沟领事分馆的日帝头目，竭尽拉拢、唆使之触事，让和龙县知事下令解散大综教。1915年12月，头

道沟日本领事分馆逮捕了大综教的中坚人物，此后，总本司把活动基地转移到汪清，继续坚持反日斗争。大综教在各地建立教会学校，在开展传教活动的同时，宣传了反日思想。后来，大综教总本司在汪清县西大坡设东道本司第一司（第二司在东边道地区）。1917年12月，大综教在延边地区拥有6所学校、173名学生和687名教徒。

1915年春，大宗师罗哲回国视察朝鲜国内教况。朝鲜总督府于同年10月1日宣布大综教为“不法团体”，禁止其一切活动。罗哲对日帝的这种镇压行径深恶痛绝，表示了极大愤慨，他为了解脱这一紧急状态，多方交涉，一无所获。罗哲终于毅然下了最后的决断。他走进据传留有檀君遗迹的黄海道九月山三圣祠里，拒绝进食，做最后一次深深的省察。1916年中秋节月朗星稀的夜晚，罗哲向一直跟随在身边的教徒留下“殉命三条”等12封遗书，痛斥日本侵略者，勉励教胞团结一致，抗日到底，使用闭气之法圆寂，终年54岁。同年10月，按照罗哲的遗言，把他的遗骸送到大综教总本司所在地——清波湖，于11月20日安葬在清波湖东山，

并立一块石碑。

(三)

罗哲殉难后，遵他的遗嘱，金教猷接任大综教二世教主。

金教猷（又名金猷）号茂圆，1868年7月5日生于朝鲜京畿道水原郡。18岁文科及第，1909年任奎章阁副提学。1910年升为纵二品嘉善大夫。同年，他辞官，矢志献身于大综教。1916年9月1日，继罗哲之后，继承了大综教的教统。1918年4月，金教猷和徐一等人同基督教派和其他反日志士39人发表了《戊午独立宣言书》，并以大综教教徒为骨干建立了反日组织“重光团”，积极促进反日活动。1919年，朝鲜“3·1”运动后，延边各地的大综教教徒积极参加反日示威：同年8月，大综教的徐一、桂和、蔡五、梁玄等人在重光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反日武装组织“正义团”。他们在汪清十里坪密林里建立基地，创建士官炼成所。1923年11月18日，金教猷在宁安县南关总本司修道室病故，终年56岁。1924年1月，大综教

的教徒们把他的遗骸迁葬到和龙县清波湖东山罗哲墓左旁。

大综教三宗师之一的徐一，1881年2月26日生于咸镜北道庆源郡安农里，原名为徐夔学，号白圃。1902年，毕业于咸一师范学校。其后的10年间在故乡从事于启蒙教育事业。1911年，抱着驱逐日寇，光复祖国的心愿，北渡图们江来到汪清县德元里，创办明东学校。1912年10月加入大综教，1913年10月，被推为参教，负责施教史的整理工作。其后，他从事阐明教理的著述工作，在短短的几年内，写出《三日神诰》、《会三经》、《九变图说》、《真理图说》、《神理注解》、《五大宗旨讲演》、《三问一答》上下篇等著作。其中《三日神诰》和《会三经》与罗哲的《神理大全》和金教献的《神檀实记》一起成为大综教的四大经书。徐一因著述庞大的“大综教经典”而颇受器重，3年半后晋升为通常别人7年半后才能晋升的尚教，仅一个月内又晋升为司徒。1916年4月13日，徐一同金教献和崔东山一起被推举为经阁特选司教。1919年初，二世教主金教献虽已表示把教主职位传给徐一，可他答应5年后才能接

任，徐一组织“重光团”，并任团长，全身心地投身于抗日武装斗争之中。不久，重光团改称“正义团”，后又改编为北路军政署，徐一推举为总裁。1920年10月，北路军政署部队在青山里战斗中，配合洪范图的独立军和其他几支反日武装部队，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在朝鲜近代独立运动史和延边地区朝鲜民族的抗日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青山里战斗后，延边地区的几支反日武装部队转移到黑龙江省密山县。12月中旬，9支反日武装部队联合成立“大韩独立军团”，徐一被推为总裁。1921年8月27日，他所属部队在密山当壁镇遭土匪的突袭，受到很大损失。面对严峻的现实，徐一悲愤之余又觉得无力挽回败局，便失去重整旗鼓的信心。当天，他按照大宗教的礼议，以教徒祈祷的姿势跪拜，念诵罗哲的《殉命三条》后，亦用闭气之法自尽，终年41岁。1927年春，大宗教教徒们把徐一的遗骸移葬于和龙县清波湖东山罗哲墓右侧。

(四)

1923年、第二世教主金教献病故后、按照他

的遗书，尹世复接任第三世教主。他是朝鲜庆尚南道密阳郡人，生于1881年，号櫟崖，原名世麟，是曾攻读数学的测量工程司。尹世复结合传教活动，着意抓民族教育，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使教势逐渐回升。到1925年，延吉、和龙、汪清3县的教徒达2100多人。同年，东北军阀政府与日寇缔结“三矢协定”后，强令解散大综教。1927年8月，汪清县警察署逮捕金吕焕等40多名大综教教徒，使汪清县的大综教组织几乎处于瘫痪状态。1928年，大综教总本司转移到密山县当壁镇，坚持传教和反日活动。1929年8月，当局取消“大综教解散会”后，汪清教会为恢复其教势积极开展传教活动，但教势一直不振，教徒仅有30余人。后来，大综教在延边地区渐渐消声匿迹。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占东北3省，大综教也转入地下，尹世复过隐居生活，秘密进行布教活动。1933年3月，为了能使大综教公开进行布教活动，尹世复到哈尔滨找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哈尔滨总领事、朝鲜总督府特派员等要人，提出大综教在满施教权认可申请书，得到日本总领事的认可。随后，他把总本司迁

至东京城，创办大综教学院。但是，他和总本司的同仁都未曾想到这是日寇的“欲擒故纵”之计。原来，日帝头目允许大综教公开活动是假，扼杀这个宗教团体才是真意。为使转入地下的大综教暴露出来，然后加以一网打尽，日寇不惜施展了阴险毒辣的诡计。朝鲜总督府的密探赵秉炫装扮成教徒，打入大综教内部，探知详情，密告其上司，终于招来了一场横祸。1942年，以尹世复为首的大综教中坚人物25人，突然遭到逮捕，尹世复被判无期徒刑，关进牡丹江额河监狱，直到1945年“8·15”光复后才获释。翌年正月，尹世复率领5名教徒，经哈尔滨前去汉城。1960年2月13日，大综教第三世教主尹世复去世，终年80岁。

大综教传入中国东北，特别是延边地区的十几年间，在开展反日民族独立运动和发展民族教育方面，曾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做出了值得称颂的贡献。

抗日女勇士——文斗灿

朴长成 整理

本世纪30年代，在抗日烽火熊熊燃起的平岗区长仁江畔，曾有一位年轻女子同日寇进行英勇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节，至今，这里的人们所称道的这位女子，名叫文斗灿。

1912年，文斗灿生于和龙县长仁江凤仪洞的一个贫穷的朝鲜农民家里，她从小聪明伶俐，倍受祖父母和父母的宠爱，她也对祖父母和父母百般孝顺，她开始懂事以后，是非分明，又有主见，即便是祖父的劝谕，认为不对就不肯听从。这正合家里的大人们，尤其是祖父的心意。

她的祖父很早就投身于抗日民族独立斗争。他经常给幼小的孙女讲日寇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罪行，以及朝鲜族人民的反日斗争历史，使她的幼小心灵里播下了反日思想的种子。

文斗灿12岁时，很疼爱她的祖父以参加反日运动的“罪名”，先后三次被凶恶的日寇捕去，关进龙井日本总领事馆拘留所，横遭种种酷刑。文斗灿经过这一事件，幼小的心灵里，开始萌发了反日思想。

1925年，14岁时文斗灿进长仁江日新小学念书。她最先加入少先队，总是率先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各种反日活动。从6年级开始，她白天在学校里刻苦学习，晚上到女子夜校给村里的妇女们教唱革命歌曲或读书识字。金炳洙抗日烈士的妹妹（现住和龙镇）60年前曾跟文斗灿学过歌，认过字。她缅怀那时的情景，高声唱出了当时学会的《少年进行曲》

我们是勇敢的抗日少年，
我们要做新社会的主人。
满腔的热血正在沸腾，
赶快起来同现社会抗争。

帝国主义就是那活阎罗，
主宰现时代罪孽有几多。
满腔的热血正在沸腾，
赶快起来同现社会抗争。

砸碎那阻挡前进的岩石，
杀绝那不共戴天的倭敌。
满腔的烈血正在沸腾，
赶快起来同现社会抗争。

那时，学校每逢星期六举行反日讲演会。文斗灿嗓音清脆，口才也好，每次演讲会都首屈一指。一次，她作为长仁江代表，参加在龙井召开的“间岛青少年演讲会”，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她身着黑衣裙，留着短发，登上讲坛愤怒控诉了把女子分为三等级，按不同价格收彩礼，象牲口一样搞买卖婚姻的社会陋习和地主，资本家双手不沾泥土和油渍也能过好衣好食的日子，而劳苦大众终年劳作也免不了忍饥挨饿的社会现象。文斗灿讲演时，在场监听的警察曾三次制止她说下去，可她不理不睬，直到讲完最后一句话才从容走下了讲坛。演讲会结束后，文斗灿被龙井日本领事馆警察抓去受讯。警察问她：“这篇讲稿是谁给你写的？”文斗灿一口咬定：“是我写的。”警察继续追问：“那么，谁指使你这样写的？”“谁也没有，就是我写的嘛”。敌人尽管软硬兼施，百

般寻根究底，可文斗灿始终只是这一句话。敌人没能抓住一点把柄，只好把她拘留三个月后释放了。

1928年，17岁的文斗灿欣然当上了长仁江反日组织的密秘联络员。她穿梭于长仁江反日12村、平岗区 and 龙井、大砬子、开山屯等地各反日组织的负责人之间，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联络任务。那时，文斗灿的家里，一连发生不测之事。那样疼爱她的祖父和父母先后过世，成了孤儿的她到三叔家里，在叔、婶两口子关照下，参加了反日活动。

炎热的夏天，一个年轻的姑娘只身穿过遮天蔽日树林，长途跋涉去完成联络任务，实在是件苦差事。寒冬腊月，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没膝的积雪，爬山越岭去赶远路，更非易事。有一次，冬季里最寒冷的三九天，文斗灿出门去执行联络任务，没有按时回家。她离家时只穿件单袄裙，脚上也只是薄袜子蹬胶鞋。她的三叔两口子惦记着侄女，坐立不安，急忙到村口和附近山野里去寻找，终于在离村子不远的岗上小道旁找到了趴在雪地外冻得不省人事的侄女。三叔赶紧背着侄女回到家里，把她

的手脚伸进黄豆里揉搓，渐渐缓冻，又用茄子杆熬成的水，反复搓洗她的双腿和胳膊，化解了冰冻。

文斗灿苏醒后，在治疗冻伤时，一直强忍着剧痛，硬是不发出一声呻吟。她的婶母在旁看着心疼地流着泪，又不愿让侄女瞧见，连忙用袄带揩眼泪。文斗灿一眼瞅了婶母难过的样子，小圆脸上绽出淡淡的微笑，双唇微微张开，低声唱起了她平时爱唱的《少年进行曲》

“砸碎那阻挡前进的岩石，／杀绝那不共戴天倭敌。／满腔的热血正在沸腾，／赶快起来同现社会抗争！”

1930年初春，学生们的反日示威斗争浪潮波及到和龙境内各地时，文斗灿带头组织长仁江各村青年学生，到头道沟警察分署和“朝鲜人民会”门前，举行了反日示威。头道沟警察分署的警察朝人群投掷红染料水，挥动棍棒驱散了示威群众。然后，开始抓衣服上染红染料水多的人。站在示威队伍前头的文斗灿又被敌人捉进拘留所，受了3个月折磨才获释。是年6月，文斗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10日，她参加在药水洞郑录仲家里召开的共

青团平岗区委员会会议，并选为平岗区团委少先队负责人。她组织少年学唱革命歌曲，散发反日传单，在村口要道放哨，开展了多种活动。1930年秋，平岗抗日游击队驻在倒木沟，文斗灿动员妇女筹集粮食和蔬菜，解决了游击队的吃饭问题，还组织开展了力所能及的其他拥军活动，支援了游击队的反日武装斗争。

1931年，文斗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初，她参加在刨地沟召开的中共和龙县平岗区党委扩大会议，不幸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与其他与会者一起被捕，关进延吉监狱。文斗灿被判处3年徒刑，同金英信、金贞吉等8位女革命者一起，被关在“政治犯”牢房里。那时，她虽有身孕，却以不屈不挠的斗志，经受住了狱中的种种严峻考验。翌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颁布“大赦令”，文斗灿以提前出狱。她回到长仁江，即与平岗区党组织取得联系，背着出生不久的婴儿，重新投入了抗日斗争。

1932年，日本侵略者对平岗区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扫荡”。那年初冬，文斗灿到药水洞去参加平岗区妇委会的一次会议。开完会，她连夜走山路回到婆家

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正忙着做早饭的婆婆见到儿媳，高兴地迎了上去，从她背上抱下孙女。

“妈，咱得小心点才好。昨晚在药水洞开会时，敌人摸上来，我们就分头跑回家来了！”她的话音刚落，突然传来了一阵炒豆般的枪声。原来头道沟警察分署的警察和陆军骑兵队已经扑到了新洞村里。

当时，中共东满特委的干部、中共和龙县委和平岗区委的一些负责人，都住在这个村子里。了解这些情况的文斗灿，不能只顾自身安危继续呆在家里。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引开鬼子们的注意力，让特委及县、区领导人的安全转移。她毫不犹豫地抱着女儿，冲出家门，背向与县、区领导者的住处，朝一个小河沟跑去。她的公公怕小孩拖累儿媳，立既跟着跑出来，追了上去一把抱过孙女。文斗灿却担心公公，又要回女儿。这功夫，敌人开着枪追上来了。不幸中弹的文斗灿同公公一起被捕，押回村子里。

敌人从文斗灿的怀里抢下孩子，摔在她婆婆的跟前。不一会儿，村上未来得及躲避的老

人们和女人们，被敌人强行赶到文斗灿的婆家院子里。

敌人摆出一副洋洋得意的丑态，当着乡亲们的面，开始审问文斗灿。

“你一个年轻的女人，不老老实实在家养孩子，为什么还干革命？”

“为什么天亮前鸡叫？”文斗灿厉声反问道。

“那是因为到了该叫的时候才叫的嘛，连这都不知道？”

文斗灿从审讯者不无讥讽的话语里抓住把柄，立即反唇相讥，义正辞严地说道：

“你说对了。我们也是因为到了该革命的时候才干革命的！到了日寇该灭亡，劳苦大众该起来打倒你们的时候，才干革命的！”

敌人恼羞成怒，象疯狗一样叫嚷要马上杀死文斗灿。然而，在早已准备牺牲的文斗灿面前，敌人的那一套恐吓手段毫无效果。敌人看出不能屈服这位在平岗地区出名的女革命者的坚贞气节，终于露出了野兽的本性。他们用刺刀捅了文斗灿和她的公公。随后，把流血不止的公媳二人关在屋里，门口堆满谷秸，放了一把火。

在院子里目睹这一惨景的村里人，听到了

熊熊烈火中传来的强音。那是文斗灿至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接连不断的呐喊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

刚刚步入20岁门槛的文斗灿，虽然壮烈牺牲，但她那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后人的心中。

名 医 南 一 鹏 羣

作者 胡寿春

南鹏羣在和龙县境内以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而蜚声遐迩，深受众人的称道。

本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初的30余年间，他曾历任头道沟中医院院长，和龙县医院副院长，县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

1892年11月12日南鹏羣生于朝鲜咸镜北道富宁郡，1913年至1918年他在咸镜北道明川郡读东医书籍。1918年3月至1922年2月在咸镜北道富宁郡富居面竹东医院任助理医师，同年3月迁居延吉县六道沟（今龙井镇）开药店。从第二年起他在六道沟东西医院学习二年，毕业后获得六道沟警察署发给的行医执照，个人开业。

1930年南鹏羣携家移居于和龙县龙水乡新民村开设“永生诊疗所”。

1934年他又赴朝鲜汉城进医学专门讲习院深造回来后继续在本村“永生诊疗所”行医。

直至“8、15”光复。

1949年南鹏翬获东北人民政府颁发的中医证书。

1952年他参加政府办的龙水卫生所工作。

1956年任头道中医院院长，翌年起任和龙县医院副院长。

南鹏翬从小勤奋好学，精读东医学经典，颇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有高明的医术和令人钦敬的医德。早在解放前他就是一位有名望的中医医师。凡知道南先生的人，都无不啧啧称羨，有口皆碑。

他治病不分民族，不管贫富，不欺童叟，关心照料患者一向一视同仁，伪满时新民村有一位叫郑礼春的穷苦人，被抓去当“勤劳奉士队员”，回来不幸得了伤寒病，没钱看病吃药，南医师获悉后多次前去诊治，给他吃了30多服药，治好了病，分文不取，郑家感恩戴德，众邻里也都赞不绝口。

南鹏翬的大女儿南姬秀今年62岁尚记得其父当年行医的诸多往事，她曾谈起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家里来了一位汉族农民，他领着一个小女孩，进屋请我父亲给她看病，我看那

小姑娘穿的衣裳很破，补丁、补丁，便知道她家一定很穷，父亲诊脉后，二话没说就把她留在我家里，给她治好了病，临走时没要他一分钱，反而叫我送给她一件我的衣裳。

还有一次是我十三岁那年的事情，有一天一名汉族妇女来治病，父亲看她穿着便猜摸她家境贫困，给她抓了几服药，也没要钱。过了一周，她丈夫来说病已基本好转，不用再吃药养一阵就好了。父亲认为，需再吃药才能巩固疗效，又抓给她三服药。翌年过春节时，这家男人为了表示感激之情，蒸了二十多个大馒头送给我家，父亲再三推辞不要，那人硬是不走，没法只好留下一半才算了事。

南先生为方便患者着想，特意设了不收费的家庭病房，让一些远道危重病人能够及时观察病情，不但方便了群众而且提高了疗效。

他治病有一条原则，就是以患者为重，有求必应，如有行走困难的病人，不能到他诊所就医，请求他往诊时，不管黑天白天冷天热天有请就去，即使三更半夜来敲门，也毫无怨言，从不拒绝。他应邀去往诊有条“规矩”，从不在患者家里吃饭，家里人说他赶上人家吃

饭时你顺便吃点也不算啥。他却风趣的说“他的饭我吃，我的饭谁吃啊？”

南鹏翬治病认真、一丝不苟，用药得法，他从多年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善用“四相方”治病，疗效颇佳，堪称妙手回春，治愈率高达90%以上。他既治各种杂病又善治伤寒症及妇女病，他本人曾说过，“伤寒病十人，我能救活九人”，当地多年看他行医的老人们说，“南先生并非夸海口，事实的确如此”。

南鹏翬虽然家在离城较远的农村，但是从四面八方前来找他看病的人很多，他的诊所里，常常是患者满屋，车辆盈门，就诊者每天不下二、三十人。

南先生高超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不仅受远近朝鲜人的赞誉，也受众多汉族人的钦佩，1936年头道地区20个村的汉族群众，曾送给他一块金字匾，以表示谢意和颂扬之意。1937年新民村全体村民又赠给他一块银字匾。至今，这里的人们还十分缅怀南鹏翬先生，无不传颂着他的医术和医德，今年81岁的李珍弼老人，每当提起南先生时，他总是伸出大拇指说：“南鹏翬可真是好人哪！是第一个好人”。

光复后，南鹏翬先生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医德上更加严以律己，急病人所急，解病人之所难，时常为无钱的军烈属和贫困户免费治病，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赞扬。1950年和龙县人民政府授给他二等功奖状，表彰南先生为“人民的好医生”。

50年代初，南先生过60寿辰时，又有一些患者联名赠送给他一面锦旗，感谢他辛勤为大众除苦灭病，做出无私奉献。

1952年南鹏翬欣然参加人民政府办的医疗卫生工作，一如既往认真负责，不仅诊治患者屡见奇效，倍受赞扬，还十分重视医务人员的业务学习，亲自编写教材，传授自己的医术和经验。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他从事中医事业四十多年，为建设和龙县中医队伍，发展中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1年南鹏翬因患病离职休养，其知道自己为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继续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便不顾病魔折磨，伏案工作，在病休期间，利用8个月的时间编写出1000多页的“四相方”。送交州人民政府卫生处，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从事医疗事业的毕生经验和医术研究成

果留给了后代，

1963年南鹏翬先生病逝，终年71岁。

和龙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吉林省和龙县委员会文史办编
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9204048号

K2